



TIANJIN SHIZHI

敬请各界朋友监督——

在内容上,提高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可读性,加大信息量;  
在形式上,活泼多样、美观大方、图文并茂、新颖明畅;  
在文字上,精心校对、求真求实、字斟句酌、力臻完美。

# 目 录

##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天津市各区地方志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3)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服务群众中践行初心使命

——市档案馆召开下沉干部座谈会 ..... 市档案馆人事处 (10)

## 廉洁文化

两晋南北朝时期无终阳氏家族的清朗家风 ..... 欧阳康 (11)

## 志鉴交流

品读《天津市西青区志(1979—2010)》札记 ..... 傅常欣 (14)

年鉴条目编写之我见 ..... 王文振 (18)

浅谈志体的“横排竖写” ..... 王双奎 (21)

## 史学百家

明清时期漕运与天津 ..... 方兆麟 (24)

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初期的斗争历史 ..... 张连亭 (31)

抗战前十年天津对外贸易与居民消费习俗观念 ..... 史宇飞 (37)

## 志述津沽

一门三进士 清正传世家 ..... 吴振清 (43)

无极拳在天津的传承与发展 ..... 韩武喜 吴俊侠 (48)

宝坻带“口”字村名探源 ..... 王宗征 (53)

关廷牧始修《宁河县志》 ..... 孟昭林 (57)

## 信息动态

市级动态 ..... (6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凝聚干事创业的磅礴动力

——市档案馆举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读书班

..... 市档案馆机关党委办公室 (封二)

提站位 聚思想 强担当 促提升

——天津市 2022 年地方志业务培训班圆满收官

..... 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封三)

2022 年第 6 期(总第 203 期)  
(双月刊)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编印单位: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

员会办公室

编 办:天津市地方志馆

编印人员:吴爱民 赵敬义

梁 娜 岳 宏

柳 杨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11 号增 1 号

邮 编:300191

电 话:022-58037686

邮 箱:tjsdagdfzg02@tj.gov.cn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号:

刊型 20210098

承印单位:天津中铁物资印业  
有限公司

本期印数:1500 册



# 天津市各区地方志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和平区】

为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进一步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持续营造热烈的浓厚氛围，和平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迅速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活动。馆领导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分别在班子成员、全体干部两个层次组织学习，通过理论中心组和集体学习的形式组织干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切实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大会精神实质，迅速将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密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践行使命担当，不断开创档案方志工作新局面、展现新作为。为进一步做好学习宣传，区档案馆在机关宣传栏张贴海报和宣传标语，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利用微信公众号、“和平档案”持续刊发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内容，在全馆上下营造热烈的浓厚氛围。

11月15日上午，区档案馆联合小白楼街道承德道社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新时代文明说·我们的十年”交流分享活动。区档案馆负责人依据地方志资料和档案编研成果，以小白楼地区的十年变化为切入点，与社区党员群众分享小白楼地区历史风貌、道路交通等方面

的变迁，在今昔对比中感悟发展成就，畅谈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心得体会。现场党员群众深有感触，纷纷结合自身实际畅谈感受，反响强烈。

## 【河东区】

10月26日，河东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传达党的二十大精神，馆领导班子及全体档案方志干部参加专题学习。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勇于担当作为，切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工作思路、具体抓手和发展成果，不断开创档案方志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档案方志力量。

会议要求：一要深刻感悟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要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通过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专题辅导讲座、研讨交流学习等多种形式，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三要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成效转化



为推动档案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思路举措，忠诚履行“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和“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职责使命，让档案方志在服务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以实际行动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

### 【河西区】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谱写档案方志事业新篇章，河西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分别于11月4日、11日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形式，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会上，全体党员干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认为，党的二十大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大会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情况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大家表示，河西区档案方志工作者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提出的“四个好”“两个服务”的要求，充分发挥档案方志“存史、资政、育人”功能，以档案方志人的担当服务全市全区重点工作，提升为民服务水平，扩大档案方志影响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

心区贡献档案方志人的智慧和力量。

### 【南开区】

10月16日，南开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全体干部集体观看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盛况，集中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

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高瞻远瞩、催人奋进，全面总结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作为新时代的方志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好、领会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重要论述精神，坚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工作的巨大动力，立足岗位创先争优，不断夯实各项基础业务，认真谋划和扎实开展好地方志各项工作，进一步增强做好地方志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南开区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

### 【河北区】

10月16日上午，河北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全体干部集中收看了党的二十大开幕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



大会所作的报告。全馆干部一致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牢记档案方志工作的职责使命，扎实推进河北区档案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发挥档案方志工作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中心城区作出更大贡献，奋力谱写档案方志工作新篇章。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10月19日和11月1日，区档案馆组织全体干部集中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会议要求，全馆上下要迅速行动，今后一段时间，各党支部要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原原本本学、原汁原味学，努力掌握思想精髓、核心要义，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方志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立足岗位，再创佳绩。要通过区档案馆微信公众号积极转发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相关内容，努力营造浓厚氛围。

### 【红桥区】

11月14日，红桥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召开全体会，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市委领导干部大会精神，交流学习体会，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强调，党支部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馆

理论学习中心组要发挥领学促学作用，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交流研讨，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促进发展的思路和建议。同志们纷纷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把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方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聚焦当前档案工作、地方志工作重点，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自觉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 【东丽区】

10月16日，东丽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组织全馆党员干部职工收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随着大会开幕，同志们全体起立高唱国歌，参与下沉疫情防控一线的干部职工也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平台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盛况。

大家一致认为，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高瞻远瞩、振奋人心，描绘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为我们开展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区档案馆将把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学深悟透，把工作着力点聚焦到全面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努力开创新时代档案方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持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档案方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把学习贯彻成效转化为工作实绩，不断提高档案方志服务能力和存史、资政、育人作用，为全面建设科创绿谷、都市新区努力奋斗。

### 【西青区】

西青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多次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推动学习贯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区地方志办要求：一是落实报告指出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要求，重新规划地方志工作蓝图，努力推动地方志工作转型升级。创新传承方志文化，不断发挥方志优势，紧贴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志鉴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二是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政治责任，坚持“一盘棋”思想，将方志工作与档案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力量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发挥档案方志在服务国家治理、重点工程建设、新农村文化建设以及传承红色基因、构建民族记忆、文化交流互鉴等方面的独特作用，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激发新活力、指引新方向，切实把档案方志工作与服务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求结合起来。三是坚持文化引领，打造特色品牌。紧

紧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一主线，通过对历史资料挖掘整理、编研论坛、展览展示等方式，传承西青精神、讲好西青故事，传播西青声音。扎实推进志鉴编修，高质量完成“一年一鉴、公开出版”。高质量推进全国“双名”工程，组织开展与运河文化、赶大营文化、年画文化、精武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文化有关的区情资料挖掘和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在新征程上努力推进全区地方志事业发展走向新境界。

### 【津南区】

10月28日，津南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召开全体干部会议，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会上，全体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和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详细部署。会议提出，按照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提出“深入学习、深刻领会、深度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实质、核心要义、丰富内涵”的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重大意义等10项重点内容。制定学习计划，党支部和党小组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紧紧围绕“三会一课”和集中学习，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坚持原原本本学、带着思考学、联系实际学、领导带头学，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常学常新。要贯彻好、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市委、区委的工作要求，全力做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做好新馆验收和搬迁准备工作，倒排工期，明确时间节点，确



保年底前按照计划圆满完成搬迁任务。同时，对照全年目标任务，全面梳理排查工作进展情况，拿出有针对性、切实有效的真招实招，推进馆藏档案开发利用、档案数字化扫描、年鉴公开出版等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 【北辰区】

北辰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结合工作实际，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

一是多措并举，保持学习热度。第一时间研究制定《北辰区档案馆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工作方案》，组织开展系列学习活动。馆理论学习中心组举办为期3天的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读书班，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学习。机关党支部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等方式，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研讨。二是创新形式，扩大宣传广度。面向全区档案方志干部和广大群众，开展多方位宣传。在馆公示栏、各楼层宣传栏、查档服务接待大厅等显著位置，通过LED屏、宣传海报等途径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北辰档案微信公众号设置“读报告、话心声”专栏，刊登全区档案方志干部学习感悟，搭建学习交流平台。积极向各级媒体和网络投稿，传递学习动态，不断扩大宣传影响力。三是压实责任，强化贯彻力度。对标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结合全馆重点工作任务，明确各级党员干部责任，落实各项工作节点要求。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优化查档利用程序，做好档案接收数字化，

加快推进国家级数字档案馆建设，全力推进部门志编修全覆盖。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落实“四个好”“两个服务”的目标要求结合起来，增强全体党员干部做好档案方志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记录好新时代的奋斗历程。

### 【武清区】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把武清区方志人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武清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组织地方志工作者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活动。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武清区地方志干部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筑牢政治忠诚，锤炼政治品格，切实肩负起地方志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神圣使命。二是对标对表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推进武清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地方志办要求和区委决策部署，强化精品意识，不断巩固武清“一年一鉴、公开出版”成果，提高“掌上年鉴”服务能力，拓展志鉴资源征集及数字开发利用方式，提升河西务名镇志申报编修质效，加强地方志质量建设，丰富史志文化建设成果，以高质量的地方志工作助力天津高质量发展。三是坚定方志文化自信，打造方志文化品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地方志工作机构要自觉承担起记录新时代、服务新时代的光荣任务，不断创造新的方志产品，开辟地方志工作新天地，努力为天津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贡献方志智慧和力量。

### 【宝坻区】

宝坻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推进新时代地方志工作高质量开展紧密结合，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高度，审视、统筹、谋划和开展地方志工作。区档案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深入挖掘区内红色档案和地方志资源，丰富馆藏资料，夯实业务基础。以“用好红色档案和方志资源，讲好宝坻故事，向党的二十大献礼”为主题，举办馆藏红色档案和地方志文献资料展，通过“伟人著作”“红色文献”“烽火年代”“知青岁月”“百姓生活”“方志春秋”六个板块，集中展示馆藏300余件珍贵档案和方志文献。

区档案馆将立足提高志鉴编纂质量和水平，抓好地方志专业人才培养和地方志干部培训，增强方志工作者驾驭和胜任新时代志鉴编纂工作能力和本领，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努力把宝坻区地方志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 【滨海新区】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滨海新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紧紧围绕“档案工作姓党”的政治属性，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活动。

以学习为本，学深悟透大会精神。一是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多形式集中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认真聆听报告，学习领会报告精神。二是迅速组织党员干部以“横纵三级”形式全方位开展学习研讨。利用党支部、党小组、个人的

纵向三级架构，利用馆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读书班、全体干部集中学习的横向三级机制，做到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内容全覆盖。三是精心组织专题学习。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参加区委为期四天的专题班学习，通过交流研讨、听取专家讲座、撰写心得体会等多种形式，深化学习效果，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做好各项工作。以宣传为先，营造浓厚氛围。一是发挥党员干部宣讲员作用，馆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接地气、贴民心，将党的“好声音”及时传递到基层群众当中，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二是充分利用馆内电子屏、微信等宣传平台，做好关于党的二十大精神权威解读的宣传报道，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三是开设“二十大精神”学习专栏，认真梳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重大理论观点，及时宣传报道学习成果和心得体会，激发起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

### 【宁河区】

连日来，宁河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系统学习。全体方志人通过学报告、悟思想、振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新时代地方志工作的实际动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宁河区地方志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一是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通过原原本本学、逐字逐句读、系统深入学，研究部署落实措



施，做到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带头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带动全体方志人学思践悟。二是丰富载体灵活学。通过收听收看、集体学习、主题党日、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精学报告原文，深悟精神内涵，交流学习体会，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全体方志人中学深悟透上持续发力、在融会贯通中加深理解、在以知促行上求得实效。三是联系实际深入学。紧紧围绕“五个牢牢把握”，跟进学习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和市委、区委有关会议精神，结合地方志工作深入思考，改进工作，使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真正成为接续奋进的“动力源”。四是精心组织活动学。利用“学习强国”“津云”和微信公众号等学习平台，积极转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一中全会期间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用好宣传电子屏，不间断滚动播放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标语，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方志人心中。

### 【静海区】

11月11日，静海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召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会议指出，静海区地方志工作者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和重要文件，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抓好当前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地方志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做到高质高效完成各项工作。会议要求，要牢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在今后工作中，要以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指引，做好第三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创新年鉴编纂，以科学发展的观念和智慧，敢为人先的胆量和勇气能动地反映社会进步的发展变化，紧扣时代脉搏，既真实记录发展历程，又具重要的时代印痕、地方个性。推进地方史编研工作，高质量完成《静海通史》编著，为天津地方史编撰提供有益探索。加强方志馆与志鉴信息化建设，更加贴近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更加贴近社会发展实际，更加贴近百姓生活，服务静海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 【蓟州区】

11月1日，蓟州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组织全体干部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蓟州区地方志工作。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历史意义。蓟州区地方志办全体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此次大会精神，全面领会把握大会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蓟州区地方志部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要求，近期蓟州区地方志部门要在“方志大讲堂”、史志“六进”、地情服务等活动中积极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教育，使更多的人民群众了解党的二十大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进一步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向高潮。下一步，蓟州区地方志办将重点围绕“名山志——盘山志”编修、乡镇志编修以及《蓟州年鉴（2023）》的编纂开展工作，不断夯实基础业务，力争推动蓟州区地方志工作向出精品目标发展。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服务群众中践行初心使命 ——市档案馆召开下沉干部座谈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务必”伟大号召，激发档案方志干部干事创业的工作热情，2022年11月8日，市档案馆组织召开参与社区防疫下沉干部座谈会。馆党委书记、馆长阎峰，馆党委委员、副馆长吴爱民参加座谈。

9月份以来，市档案馆选派53名党员干部下沉到社区践行初心使命，和基层社区一线工作人员并肩作战，用党性筑起社区群众生命健康的防线，用担当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用责任彰显档案方志干部的优良作风，下沉干部的工作表现和优良作风受到社区和群众的一致肯定和表扬。

会上，16名下沉党员干部代表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服务群众中践行初心使命”进行交流发言，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事例，从不同角度讲述了自己在下沉工作一线的所做、所思、所想。

下沉干部认为，“下”是通往考场的路，“沉”才是真正的考题。青年干部与伟大时代同向同行的历史主动，闻令而动、心怀大局、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是下沉干部最闪亮的标签。大家一致表示，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务必”伟大号召的光荣实践，也是接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教育，每名同志的党性修养得到进一步锤炼，为民服务本领得到进一步增强，思想作风得到深刻历练，深刻体会到人民群众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源泉，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体党员干部只有扑下身子、甩开膀子、干出样子，才能以实际

行动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下沉期间喜逢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下沉干部们在社区认真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积极参加党的二十大宣讲活动和体会交流活动，助力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社区落地落实。

馆党委书记、馆长阎峰对我馆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市委号召下沉社区参与疫情防控等工作给予高度认可，对同志们为馆取得的荣誉予以表扬。他指出，下沉社区参与防疫工作，对于大家是一次难得的党性锤炼和实践锻炼的机会，全体下沉干部要将参与基层疫情防控工作的实践经验运用到今后的工作学习中。一是要积极投身到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去。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同思想工作实际、同此次下沉社区实际、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批示精神紧密联系起来，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二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进各项工作中，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档案方志工作更好地服务全市重点工作、重大活动，提升档案方志公共利用服务水平，让人民群众共享档案方志事业发展成果。三是要发扬团结奋斗精神。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锚定前行目标不动摇，始终保持团结的状态、奋进的姿态，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为档案方志事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档案馆人事处)

# 两晋南北朝时期无终阳氏家族的清朗家风

欧阳康

无终县，秦朝初置，治所在今天津市蓟州区。两晋南北朝时期，无终县先后属北平郡、渔阳郡。当时，在无终县出现了绵延多代且兴盛不衰的阳氏家族。从西晋末年开始，无终的阳氏家族就有人在朝廷中担任重要官职，对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无终阳氏家族中，望族有两个，一个是在西晋末年官至辽西太守的阳耽开创的家族，一个是北魏时期官至国子祭酒兼幽州大中正的阳尼开创的家族。这两支阳氏家族，都出现了不少清正廉明、克己奉公之士。他们的清朗家风、廉政事迹，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开展家风建设和廉政教育、涵养清风正气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 一、谦恭谨慎的阳骛

阳骛（？—367），字士秋，阳耽之子，《晋书》有传。阳骛少年时代勤奋好学，熟读经史。初任平州别驾，多次进献治国安邦之策，大多被采用。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廆认为他是个奇才，升他做辽东太守。

晋成帝咸康三年（337），慕容皝继位。慕容皝摆脱了与东晋政权的隶属关系，建燕国，自称燕王，以棘城为国都。慕容皝任命王诞为左长史，王诞认为阳骛才能超众远在自己之上，经慕容皝同意，把左长史的位子让贤给阳骛。阳骛跟随慕容皝南征北战，对前燕局势的稳定，疆土的扩展作出重大贡献。慕容皝对他越发尊重和信任，先后提升他为司隶等职。慕容皝重

病后，准备传位给他的儿子慕容儁，临终前留下遗嘱：“阳士秋忠诚可信，精明强干，是个难得的人才，你可以把大事托付给他！”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慕容皝去世，慕容儁登基称帝，定国号为燕，历史上称之为前燕。不久，遵照他父亲的嘱托，拜阳骛为太傅，任命为尚书令。慕容儁大举用兵，驰骋中原，占据了黄河以北大片疆土，并将都城先后迁至蓟城、邺城。其间，阳骛功勋卓著，成为慕容儁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慕容儁驾崩，其子慕容暐继位，委任阳骛为太尉（“三公”之一）。阳骛不敢接受如此高的官职，诚恳地请求慕容暐收回成命。慕容暐多方抚慰、挽留，阳骛只好就任。

阳骛虽位高权重，却始终保持勤奋节俭、谦虚谨慎的作风。朝中大小官员非常尊重他，见面都要给他行礼，可他丝毫没有骄傲自大、洋洋自得。他在从政期间反对奢侈的作风，并且身体力行。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本来可以乘坐高头大马、气派的新车，可是他乘坐的总是瘦马拉的旧车。死后，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

## 二、勤政节俭的阳裕

阳裕（约282—344），阳骛的堂弟，字士伦，《晋书》有传。少年时期，父母亲双双去世，弟兄也过早地夭折，他在孤独中度过了童年。同族人大多不了解他，只有他的叔父阳耽（阳骛之父）对他非常欣赏，背地里夸他：“这



孩子长大后，不仅是阳家最优秀的人物，而且可以干一番大事业，成为国家的栋梁！”

阳裕因才华出众，受到幽州刺史和演的赏识，被和演聘为主簿。后来，王浚嫉贤妒能，对阳裕极力打压，把他调为治中从事。不久，后赵大军攻克蓟城，王浚被后赵军擒斩。后赵国王石勒听说阳裕才干超群，想重用阳裕。但他派人召见阳裕时，才知道阳裕已经投奔辽西段氏。

段氏首领段疾陆眷见到阳裕非常高兴，当即拜他为郎中令、中军将军，其地位相当于上卿。自此，阳裕便忠心耿耿地为段氏效劳。段氏与创立前燕的慕容氏都是鲜卑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系良好，还互通婚姻。后来，为了争夺地盘和财物，竟然反目为仇。特别是在段氏政权发生内乱、段辽上台执政之后，两个政权剑拔弩张，征杀不断。针对这种情况，阳裕诚恳地劝说段辽。段辽却不肯听从阳裕的劝告，把阳裕从自己身边赶走，让他去当北平太守。不久，慕容氏与后赵政权联合对段氏政权进行夹击。当段氏政权危在旦夕之际，段辽才悔恨地说：“只恨当初没听阳裕的话呀！”

此后，阳裕归降于前燕王慕容皝。慕容皝早就听说过阳裕的大名，知道他才干超群，不但没有为难他，而且委以郎中令、大将军左司马之职。慕容皝是比较明智，善于用人的国君，阳裕在他手下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慕容皝准备把国都由义城迁到和龙，他把督建新都城的重任交给了阳裕。阳裕不辞劳苦，废寝忘食，从总体设计到各项工程的监督管理，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一丝不苟。结果，这项巨大的工程不但提前了工期，而且节省了资金，慕容皝对此赞不绝口。

尽管慕容皝对阳裕宠信日加，阳裕的声誉、地位越来越高，但他的品德性情并没改变，吃

喝穿戴仍然很朴素，言谈举止没有丝毫的骄矜与傲气。对于朝内外人士，不论地位高低，能力强弱，他都一视同仁，给予礼遇。范阳诗人卢谌曾说：“从晋朝的清平年代算起，一直到现在，像阳裕那样忠诚可信、清廉节俭的，找不出几个！”

### 三、刚直不阿的阳固

阳固（467—523），字敬安。阳尼之孙。少年时代，阳固不拘小节，好练武术，崇尚侠义，后来认真读书，文才大进。步入仕途后，“刚直雅正，不畏权御，居官清洁，家无余财”，有清官之誉，《北史》载有他的传记。

北魏太和年间，阳固跟随大将军、宋王刘昶攻打义阳。刘昶性情暴躁，刚愎自用。阳固却不管这一套，有什么想法就直截了当地跟他讲，常使刘昶下不了台。为此，刘昶耿耿于怀，甚至想找机会把他除掉，就派阳固领兵攻打一道险关。可是，阳固欣然接受这一重任，在指挥中勇敢果断，镇定自若，很快就击溃敌兵，夺占险关，为大军打通了前进之路。对阳固在这场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刘昶感到非常惊异，不但消除了除掉他的念头，而且产生了委以重任的想法。凯旋后，他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孝文帝元宏。不久，阳固被任命为大将军府参军事，后又被提拔为中书侍御史。

深明大义，直言敢谏，是阳固为官的最大特点。北魏宣武帝元恪是个虔诚佛教徒，终日沉醉于念经拜佛之中，把军国大政全部委托于外戚，而这些外戚只知道横征暴敛、中饱私囊，弄得民怨沸腾，国力衰微。针对这种情况，阳固呈奏了《谠言表》。在这份表章中，他批评了宣武帝的弊政，提出了富国强兵之路。但是，昏庸的宣武帝把阳固的意见和建议束之高阁，醉心于念经拜佛，依然把各项政务委托给外戚。阳固忧国忧民，愤懑难平，撰写《南北二

都赋》进行讽谏。此赋揭示了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京都洛阳附近平民百姓的艰难困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传世之作。

阳固坚持正义，不畏权贵。宣武末期，中尉王显建筑了一座高大宽阔的宅院，竣工后，他把朝中官员请到自己家里，大排宴筵。王显在宣武帝面前非常得宠，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酒喝到兴头上，他得意地问阳固：“你看我的这处宅院怎么样？”阳固回答说：“晏婴的宅院低洼狭小，可是晏婴的事迹却流传至今。高大豪华的住宅容易引起灾祸，这个道理《易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这宅院就像旅馆一样，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久住，你要好自为之啊！”王显听了这些话非常扫兴，不知道如何回答。

后来王显为了挽回面子，故意在阳固面前炫耀：“我担任太府卿之职，府库财物充盈，你看我的能力、业绩怎么样？”阳固知道王显是怎样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的，直截了当地说：“你抽取大小官员应领俸禄的四分之一，又把各州郡的赃赎款全部收缴到京都，你现在府库中的财物能不充盈吗？但是，既然有善于聚敛财富的官员，就难免出现贪污盗窃的蠹虫，你可得多加警惕呀！”王显听了这番话极为恼怒，怀恨在心，借机向宣武帝进谗，竟将阳固罢官。

宣武帝死后，孝明帝元诩继位，阳固又被启用，担任尚书考功郎中之职。他将各州郡推荐上来的人才聚在京都进行考核，然后根据考核成绩安排高低不等的职务，不合格者则淘汰出局。阳固的这些做法，为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

北魏大军攻硖石，阳固又一次投笔从戎，披挂上阵，在仆射李平手下为官。李平对阳固的智勇双全非常欣赏，军中大事都要跟他商量，后来又命阳固统领水军。孝明帝的叔叔、时任太傅的清河王元怿认为阳固是个难得的人才，

就向皇帝举荐，阳固因此而被提拔为步兵校尉。不久，又被派遣到汝南王元悦府中任郎中令。当时元悦很年轻，常做一些违法之事，阳固苦口婆心地开导他，约束他，使元悦这位王爷对他这位下属敬畏三分。元怿又把阳固提拔为洛阳令。阳固在任上勤政爱民，公正廉洁，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威望越来越高。元怿被任命为太尉后，又提拔阳固为从事中郎。

后来，元怿因遭受政敌的陷害而身亡。发丧期间，元怿的亲戚朋友都不敢去悼唁，唯恐招灾惹祸。阳固认为元怿是冤枉的，加之又有知遇之恩，所以他不怕受牵连，独自去往元怿的丧所，放声痛哭，停留很长时间才离开。对他的举动，很多人予以称赞：“阳固真是个君子啊！”

阳固写有一篇题为《终制》的文章，专门提倡节俭，反对奢华。临死前，他嘱咐家人按照这篇文章所阐述的理念操持家务。由于他居官清廉，屋里连件像样的家具摆设都没有，办丧事的钱也是靠亲戚朋友凑齐的。

#### 四、正直敢言的阳休之

阳休之（509—582），字子烈，阳固之长子。阳休之曾任幽州大中正兼侍中、和州刺史等地方行政长官，其间他大力推行仁政，竭尽全力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受到民众的敬仰与爱戴，“去官之后，百姓树碑颂德”——调任后百姓为他树碑，以歌颂他的功德。

北齐天统中（567年前后），阳休之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其间，他公正无私，不徇私情，严格按照当时有关规定选拔人才，因而获得人们的称赞。曾任国子助教的熊安生，是位学识渊博、名望很高的学者，父亲死后，他为给父亲守丧而辞职回家。守丧期满后，吏部本应及时给他安排职务，但是有关官员却把他忘在脑后，很长时间没有理他。熊安生是清高自赏的

（下转第23页）



# 品读《天津市西青区志(1979—2010)》札记

傅常欣

《天津市西青区志（1979—2010）》（以下简称该志），是天津市第二轮区县志编修的收官之作，也是一部特色鲜明、质量上乘的城市区志。

## 六大亮点

### 一、两条特例规定可圈可点

《中国方志大辞典》：“凡例即说明著作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方志百科全书》：“凡例对志书编纂起指导和制约作用，是读者的阅读指南，也是评价志书优劣的重要方面和主要依据。”

该志凡例之通例、分例和特例的规定均言之有序，尤其是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特例的规定，对于天津市第二轮区县志编修而言必不可少、十分重要。这两条规定的内 容是：“十五、由于本志 1979—1995 年记述与上志有时间重合，本志对重合内容采用新视角择要简记，以保持对改革开放记述的相对完整。”“十六、本志设前志勘误表，对前志发现的舛误予以更正。”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08 年制发的《关于启动区县地方志第二轮编修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第二轮地方志记述上限统一确定为 1979 年，下限范围为 2005 年至 2010 年……要处理好与首轮地方志书的交叉衔接关系，并注重对首轮地方志书内容的补遗和纠误。”天津市

首轮区县志的记述下限多为 1995 年，第二轮多为 2010 年。这样，重修、续修部分分别为 17 年和 15 年。因此，天津市第二轮区县志的编修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续志”，而是兼有重修和续修的性质，对前志的补遗和纠误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摆在全市第二轮区县志编纂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需要统筹谋划、妥善处理。同时，已出版的第二轮区县志对前志普遍存在重补遗、轻纠误现象，一些志书并未设置前志勘误表，以致出现读者看到两轮志书的说法不一致而不知何者说法正确问题。方志学者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sup>[1]</sup>一书中建议续志要增设《纠误篇》。

看上去颇为简单的两条特例规定，实则蕴含了编纂者对全志谋篇布局的深思熟虑，诠释了他们对依法修志的深刻领悟，体现了对“直笔著史”工作的严谨态度。

### 二、“西青异彩”令人耳目一新

西青异彩即对“西青历史上于国内甚至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且精神实质一直得到延续、继承的”（凡例）人、事、物集中于志首予以详述，使该志地方特色跃然纸上、赫然在目。西青异彩从内容上看，“杨柳青木版年画”不但记其源流、画店、画师，还记其体裁、工序、复兴等；“武林双杰”记述霍元甲和韩慕侠的

[1] 仓修良著：《方志学通论》（修订本），方志出版社，2003 年版。

生平事迹及时人评价等；“杨柳青人赶大营”记述该独特历史事件的缘起和历时 70 余年的兴衰起伏，读后令人印象深刻。从体裁上来说，应是专记（类似首轮志书“要事纪略”等名目的专记），并充分发挥了纪事本末体“尽事之本末”的优长。

西青异彩别开生面地反映了西青区人文历史的变迁，增加了全志的历史厚重感，并起到了对前志补遗的作用，特别是在记述上所采取的以事系人、以人系事和以此系彼（记述一件事连带记述与之密切相关的事项）三者相结合的方法，值得深入研究。笔者以为，若将文化部类所涉及的诸如年画宣传、杨柳青年画馆、霍元甲故居、霍元甲墓、世界精武大会、霍元甲文武学校和人民政府编提到的杨柳青年画协会、年画销售，以及附录中收录的杨柳青南三十六村画业史略等，一并集中于专记中记述，将会使西青异彩更加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 三、“基础设施”设置不落窠臼

从天津市两轮区县志编修看，设置基础设施专志（编）的凤毛麟角，从外埠区县志编修看也为数不多。尤其对基础设施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如《普陀区志（1987—1995 年）》的基础设施编包括海运设施、陆运设施、民航设施、电信设施、供电设施、供水设施，《丰南县续志（1986—1993）》包括交通、电力、邮电、城乡建设、水利、环境保护。同时，编（章）题目有的写作基础设施建设、有的写作基础设施与基本建设等。但像该志在人口编之后即立基础设施编（下设城镇设施、交通设施、邮政电信设施 3 章），而又在其后将城乡建设、水利电力、运输邮政电信分别立编的还是难得一见，可谓自成一派。

基础设施独立成编，势必涉及全志整体性与专志相对独立性的关系处理问题，该志对基础设施的设置在给我们提供一种模式的同时，也引发对如何处理好这一关系的深度思考。

### 四、“经济要览”编写颇具匠心

在经济部类之首设置经济综述（经济环境、经济总情、经济总述）编，是首轮地方志书在篇目设置上的重要创新成果之一，这一创新成果在全国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中得到有效应用。

从中指办编著的《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文件及志书篇目汇编》看，设置经济综述的志书占了不小比例，但也出现了同“基础设施”相似的情形，即对“经济综述”这一概念的界定不甚一致，有的还大相径庭。如《商丘地区志续卷》的“经济综述”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投资结构、经济效益、人民生活。《眉山县志（1988—2000）》包括国民经济概况、培育市场体系、民营经济示范区、对外开放、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同时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管理分别独立成篇。《兴文县志（1986—1995）》更是将经济综述纳入经济综合管理编作为首章。

从方志界对宏观经济编的理论研究情况看，西樵认为经济综述编应设经济发展概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经济效益、国民经济综合指标、居民生活 6 章（《〈经济综述〉编纂浅谈》），张文桂认为应设宏观经济发展总势、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经济效益 4 章（《论〈经济综述〉的编纂》）。刘栋良则认为应以经济结构篇替代经济综述篇，经济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交换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国民经济综合指标（《谈宏观经济篇的设置》）。



该志“经济要览”编按照《当代志书编纂教程》<sup>[1]</sup>所列篇目设发展战略、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经济体制改革4章，吸纳了最新研究成果，消除了以往设置经济综述的一些弊端。若将经济开发区编调至此编之后，似更能增强西青区宏观经济的“要览”性。

### 五、重续比重处理恰如其分

“详近略远”这一修志原则对于天津市第二轮修志来说被赋予了某种特殊含义，关乎对志书质量优劣的评价。“详近略远”脱胎于“详今略古”，乃是撰史修志的一条定律，如《史记》所记汉事内容即占一半。

17年的重修部分与15年的续修部分，客观上要求要恰当处理好二者比例关系，否则易出现与“详近略远”原则相悖现象。该志按照“取前志之精、补前志之缺、纠前志之误”的要求，把重修部分大体控制在全志篇幅的1/3左右，笔者认为这样处理较为科学合理，符合第二轮修志的实际。

诚然，即使不涉及重合内容的续志，也在一个“续修方志与前志的关系及其处理问题”（林衍经），正如《天台县志（1989—2000）》主编庞国凭所说：“修好后志必须研读前志……忽视、脱离前志是编不好续志的。”

### 六、图表运用得当篇幅适中

据笔者统计，该志共有图11幅、照片259帧、表格258个，均具有典型性和资料性，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改革开放32年来西青区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表格的设计科学合理、要素齐全，

并绝少有入志资料在文、表记述中重见迭出现象。“一图贤于十万师”“一表抵万言”，图（照）体、表体的综合运用不仅增强了读者的视觉冲击及志书图文并茂的效果，而且对缩小整部志书的篇幅起到很大作用。

该志计100.7万字（前志为200.3万字），在全市第二轮区县志中属于“小部头”。天津市首轮区县志大多在150万字以上，这是因为首轮区县志具有明显的统合古今的“通纪”特征，而第二轮区县志的记述时限只有30年左右，没有在篇幅上超过前志的必要。方志学者莫艳梅在《谈控制志书篇幅的认识误区》一文中指出：“篇幅长的志书不一定不好，篇幅短的志书不一定就好，关键看质量。”<sup>[2]</sup>笔者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但同时认为志书应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缩小篇幅，尤其是断限为二三十年的续志更应如此。

志书篇幅过大抑或与元代许汝霖在《嵊志序》中讲的“择焉不精”和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通论》中讲的“取材无当”不无关系，材料的取舍对于成就一部精品佳志至关重要。方志学者来新夏在《志域探步》中写道：“有人认为：地方志既然是资料的全面反映，那就应该有闻必录，不加选择。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所谓有闻必录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是历史自然主义。”<sup>[3]</sup>事实上篇幅的压缩并不意味真正有价值的历史信息量的减少，在缩减篇幅的同时扩大信息量也不应该被视为悖论。古代“言高旨远，辞约义微”“研削繁芜，精炼文辞”等简洁史志书籍的方法迄今仍值得效仿。从这个

[1]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当代志书编纂教程》，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

[2] 莫艳梅著：《莫艳梅方志探论》，方志出版社，2018年版。

[3] 来新夏著：《志域探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意义上讲，该志把篇幅控制在适宜程度的做法值得称道。

### 值得探讨的问题

#### 一、关于无题小序设置问题

该志采用章节体编纂，除了志首设概述，各编、章前均设无题小序，部分节、目、子目前选择性地设置了无题小序。志首设概述，编（专志）前设无题小序已成为第二轮修志通行的做法（可视为对首轮修志的继承），章前悉数或部分设无题小序也较为普遍，节、目前设无题小序的只是偶有所见。

《当代志书编纂教程》专题阐述了述体编纂，方志学者西樵也曾发表《方志卷首“无题小序”编纂研究》<sup>[1]</sup>一文，但均是在志前概述和编（卷）前无题小序这两个层级上进行研究，并未涉及章及其以下层级无题小序设置问题。因此，就章节体的志书而言，章、节、目等层级是否需要设置无题小序，是全部设置还是有选择性地设置，设置了又该怎样去写，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编（卷）前无题小序又是怎样一种关系？所有这些都需要做深入探讨。

#### 二、关于宗教内容入志问题

宗教内容是地方志书不可或缺的部分。两轮修志形成了两种宗教内容的设置：一种是集中式，即设专编，如《崇明县志》；或设专章，如该志。另一种是分散式，如《白城市志（1986—1998）》在政权行政政协篇行政机关章中设民族宗教节（其中写宗教管理），又在风俗民情篇中设宗教章（写宗教事务）。《当代志书编纂教程》讲：“为着记述的完整性和便于查用，还是集中在‘宗教’章一处记述为好。”但

问题是，非民族聚居区和宗教内容较少的地区在修志中往往把民族和宗教合为一章，如果分散在党政部类和风俗民情编中记述是否更符合“合理交叉”和“因事定制”原则（如民族有关内容就需要在人口编记述），即便是把宗教内容集中为一章记述，那么这一章是在党政部类中设置好，还是在风俗民情编中设置好？

#### 三、关于社会保障编写问题

首轮区县志一般设劳动人事编，用以记述劳动和人事行政管理部门所管理的事务。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出现在第二轮志书的编题中。该志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编中设社会保险章，下设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生育保险4节。这样设置篇目具有普遍性。

《当代志书编纂教程》倡导社会保障设专志记述，并提出其所含内容应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核心成果——《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指出：“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大体系及商业保险、慈善事业等补充保障构成。”据此，《天津市河北区志（1979—2010）》在社会生活编中设置了社会保障章，下设机构沿革、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红十字会6节。这便涉及一个为广大修志工作者重视的问题，即如社会保障之类的内容，是按科学分类设置好，还是按现实社会分工设置？这些都有待在今后的修志实践中寻找答案。

（作者单位：河北区地方志办）

[1] 任根珠著：《西樵方志论丛》，中华书局，2013年版。



# 年鉴条目编写之我见

王文振

年鉴是通过条目的形式，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完整展现出来的年度资料性文献。条目是年鉴的细胞和基本单元，是年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部年鉴的灵魂。条目编写的好不好，直接关乎本部年鉴能否成为精品的关键所在。作为一名年鉴撰稿人，在年鉴条目编写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条目体的撰写及注意事项，为努力争创精品年鉴打下坚实的基础。

## 一、条目的分类

年鉴的条目一般分为三类，即综合性条目、常规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

### （一）综合性条目

综合性条目是年鉴中最重要的条目，其表现形式是综述、概况等，反映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或一个单位上一年度的主要工作情况、基本信息和基本面貌，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顺序上排在所有条目之前。在年鉴编纂中，撰稿人普遍反映综合性条目比较难写，容易写空，不实。这就要求撰稿人及编辑在撰写综合性条目时，力求做到全面性、连续性、可比性，以便给读者提供集中、系统的信息资料。全面性就是要将本年度工作的新成就、新特点、新经验、新问题作全面的概述，使读者对本地区、本行业或本单位的全貌能够一目了然。连续性是指条目所反映的事项、记述的事实应注意前后联系和上下连接，使读者能够准确清楚地看出事物发展的轨迹。基本资料尤其是重要数据要逐年反映，不能中断，要体现其承上启下，相互连接的关系。可比性就是要上下照应，横向对比，不仅要同上一年的情况进行比较，还

要横向比较。通过比较可以明确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优势和差距，为读者提供更有价值的资料信息。以某部年鉴的概况为例，“2019年，××区组织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政治建设统领组织建设，强化政治担当，紧盯服务大局，狠抓工作落实，为推进××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这类综合性条目的撰写就有些内容空洞，言之无物。再以《北京海淀年鉴（2017）》组织工作概况为例：“2016年，区委组织部工作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区、镇领导班子换届为主线，推进组织工作各项任务落实。发展党员1335名。截至12月31日，全区有基层党组织7282个，中共党员173911名（不包括驻区中央、市级单位和部队等位于海淀区、但组织关系不隶属于海淀区委的党组织和党员）。其中，女党员82037名，占总数的47.17%；少数民族党员6837名，占总数的3.9%；35岁及以下的党员30894名，占总数的17.76%；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党员121416名，占总数的69.82%。全年调整处级领导干部228名，其中提拔62名、交流76名、改任90名；调整处级非领导干部83名，其中调研员22名、副调研员61名，包括行政团职军转干部50名。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表彰100名优秀共产党员、10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上述两个概况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概况的写法应为“基础信息+大事要闻”。能用数字说话的，尽量用数

字形式描述，避免空洞无味。

### (二) 常规性条目

常规性条目是记述工作的一个侧面，内容相对独立和完整。其主要特征有两个：一是标题相同，内容常新；二是连续记载，不断档。如“公安”分目中的“打击犯罪”“社会治安管理”，“检察”分目中的“刑事检察”“民事检察”，“法院”分目中的“刑事审判”“民事审判”“行政审判”，以及“合作交流”中的“招商引资”等，都是常规性条目。以《河西年鉴(2018)》为例，“【招商引资】引入华润电力智慧能源(天津)有限公司、中能建(天津)投资有限公司、中交智运有限公司、中电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中交(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津投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天津金隆源典当有限公司、天津银瑞盘鹰典当有限公司等金融、人工智能、新能源等5000万元(含)以上高端服务业企业17家。促成华润置地增资约79亿元人民币入股天津城投置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49%的股份(这一项目是2017年以来，天津市最大一笔成交金额的混改项目)，服务银河购物中心更名为华润自有高端商业品牌‘万象城’”。常规性条目的撰写因其固有特点，需要撰稿人在编辑过程中注重连贯性，与上年度内容形成对比，在继承上年度内容的同时，不断更新、创新，将本年度特色凸显出来，避免内容重复，最终做到从延续走向发展。这就要求撰稿人在编纂常规性条目时，从条目的系统、连贯、可比方面入手，注意运用数字、新情况、新问题等形式突出本年度特色。

### (三) 单一性条目

单一性条目是单独记述某一具体事物的信息实体，是年鉴中最新鲜、最活跃、最有个性的内容，也是年鉴条目的主体。按其反映对象的不同，还可细分为单一记事条目、机构条目、会议条目、产品成果条目及人物条目等。在写

单一性条目时，要注意精选条目，做到专、精、新、特。单一性条目叙事记述比较灵活，在年鉴中占有较大比例，它以社会生活中某一具体情况为内容，从微观上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状态和特点，通过具体的事件，准确全面地反映一个单位的全貌，也就是从小事入手，力争写出具有全局意义的条目，特别是那些具有新颖、独特意义的事情、新生事物一定要单独列条。对单一性条目要精选精编，特别对具有一定价值，突出本地区特色的“第一”“首家”“之最”要认真记载，对本地区的重要活动、重大事件、重要成果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要表述清楚。

综合性条目、常规性条目及单一性条目，三者相辅相成，点面结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年鉴的信息资料体系。

## 二、条目的撰写

### (一) 条目选材

条目选材就是立条。在浩繁的资料中，什么内容可以写成常规性条目，什么内容可以写成单一性条目，这是年鉴撰稿人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单一性条目的选材。单一性条目要围绕“大事”“要事”“特事”“新事”和“亮点”来选材，既要报“喜”，也要报“忧”，既反映成绩，也反映问题，做到客观求实。例如，2019年《河西年鉴》就专门记述了“12·1”城市大厦火灾事故。

### (二) 条目标题

条目标题是条目的“眼睛”，通过标题可以判断出条目的质量。撰写条目标题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项原则：1.一句话标题，忌长标题；2.主题词尽量前置；3.形容词、表程度的副词和抽象性词语不能用。例如：有些部门报送的年鉴条目“促进街域经济发展，以优质服务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可以直接概括为“街域经济”。

### (三) 条目要素

条目要素一定要齐全。通常有六要素，即时



间、地点、事件、人物、原因、结果，有的条目还需要有背景介绍。条目内容一定要与条目标题相符，这是保证年鉴编纂质量的关键。在年鉴编辑过程中，题文不符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应引起撰稿人的高度重视。

#### (四) 条目语言

条目体语言，以说明为主，兼有记叙。其主要特点是：1.简洁，即开门见山，直陈其事；2.准确，即资料可靠，数据准确；3.平实，即朴实无华，用事实说话；4.不溢美，即客观记述，不把年鉴当作“功劳簿”；5.不隐恶，即秉笔直书，既报喜，也报忧；6.不夸大，即不吹嘘，不造假；7.不缩小，即不隐瞒，不少报；8.不议论，即述而不论，不带个人主观感情色彩。

#### (五) 撰写规范

年鉴编纂虽然是众手所成，但全书表述和书写形式必须做到规范统一，这是年鉴编纂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考验年鉴编辑水平的重要指标。如对单位的称谓，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如河西区档案馆），再次出现时用简称（区档案馆），做到全书规范统一。简称要用规范简称，如“河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简称“区人力社保局”，不要用“区人社局”。

### 三、提升条目编纂质量应注意的事项

通过几年编纂《河西年鉴》的实践，深深体会到做年鉴撰稿人容易，而做一名合格的撰稿人难。现就此谈点个人浅见。

#### (一) 树立精品意识，提升条目质量

年鉴是特殊的文化“产品”，肩负着“存史、资政、育人”的特殊功能，年鉴是一种为人们“知往鉴来，温故知新”提供服务的大型资料型工具书，它的作用是其他一般工具书无可比拟的。由于年鉴的这种特殊功能，对其知识的严密性、史料的真实性、选材的实用性，立论的权威性要求都是很高的。因此，年鉴的撰稿人要有精品意识，加强责任心，要有自我加压，

争创一流的精神，努力撰写出精品条目。

#### (二) 发扬敬业精神，保持高度责任感

年鉴是对外交流的窗口，编好年鉴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严肃的工作。年鉴撰稿人要完成好撰稿任务，必须要有敬业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要把年鉴撰稿当作一项事业来做，而不仅仅是当一项任务来完成。撰稿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真实地记录和反映现实，要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撰写，努力钻研年鉴理论，认真学习中指组下发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及《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为提升年鉴整体水平而努力，为后人留下真实、全面、准确、翔实的历史资料，为繁荣年鉴事业而无私奉献。

#### (三) 全面收集资料，精心组织加工

一个地区一年内各方面发生的变化很大，如何全面客观反映出一年的变化，需要统筹全局，在选材上全方位考虑。首先是视野宽广，及时捕捉信息，广泛收集资料，资料积累工作做得越细越好、越多越好。笔者认为，年鉴资料来源主要是各系统、各部门提供的年度工作总结、各类统计表、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各类档案、信息、照片等，只有掌握大量资料，才能进行比较筛选，将主要的有价值的资料收入年鉴，从而达到优化选择的目的，为编写打下坚实的基础。对资料进行深度加工、精细化加工是决定年鉴稿件质量的关键所在。通过对原始信息资料进行认真筛选、对比、类比、综合概括，把能反映一个地区一年内的全面情况和主要成果、有影响的事件等信息资料通过条目反映出来。

总之，年鉴是一个系统全面的工程，必须加强撰稿人及编辑的精品意识，使每一个年鉴撰稿人进入角色，才能抓出精品选题，编出精品条目，从而创出精品年鉴。

(作者单位：河西区档案馆)

# 浅谈志体的“横排竖写”

王双奎

地方志编修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一本志书，就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笔者有幸参与了《北辰区财政志》编修，在付出努力的同时，也学到不少知识，收获颇多。现就志体的横排竖写谈些点滴体会。

## 一、“横排竖写”是编修志书约定俗成的行文方法

何为志书的“横排竖写”？“横排”即分门别类，横向排列各项事物；“竖写”则按照时序，纵向记述各项事物。“横排竖写”是古人写史的常用方法，例如《史记》《二十四史》都是“横排竖写”。究其原因，“横排”可就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定性，“竖写”则可依照时序还原事物发展变化的全貌。此方法被后人广泛学习采用。志书也不例外，“横排竖写”是志体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编修志书约定俗成的行文方法。

志书采取“横排竖写”的方法是由方志的内容决定的。一部志书事涉广泛，要将事类繁多、错综复杂的资料收入一志，只有横排门类、竖写史实，才能囊括诸事、连贯古今。横排解决的是分类问题，竖写是纵向的记述史实，做到横排不缺主项，竖写不断主线，实现横纵两个系统的有机结合。

《北辰区财政志》属于部门志，即以特定部门为记述对象的志书。记述上限为1953年，下限为2017年，时间跨度65年。记述的重点是部门机构设置、体制改革、业务职能、运行管理等方面内容。它不同于区域志，也不同于行

业志，它的特点是“小而全”的百科全书。各类事物是横排门类的条件，丰富的历史资料是竖写史实的基础，把握好这两点，就可以把一个部门60多年来的历史和现状，发展和变化，系统、连续、完整的呈现出来。

## 二、“横排”是分类而不是分期

“横排门类”是对错综复杂的事物进行科学、合理的梳理和分类，即将一个部门的人、事、物等各方面的资料按照形式逻辑划分成若干门类，以类系事，横向排列，各大类又可用同样的原则划分若干小类，若有必要各小类还可析分若干小目，层层横分。横分门类，难在确立分类标准，这取决于编者对本部门工作的熟知程度，对资料的驾驭能力，是广义上学识水平的综合体现。

志书的章、节、目设立就是“横排”门类的具体体现。在动笔之前要对本部门的工作职能、科室分工、入志资料等进行反复的熟悉、消化、研究。章、节、目设置后要看篇目是否符合志体要求，分类是否全面合理，主体特点特色是否突出，重要门类有否缺失等。“横排”的主要标准是“门类齐全，不缺主项；分类合理，归属得当；排列科学，严谨有序”。

在分类设置时，既要避免缺失主项，又要防止事无巨细。凡设立一个门类就要纵写始末，如果分类过细且缺失资料，就会出现东拉西扯，牵强附会、你争我夺，肢解割裂、交叉重复，使有限的资料碎片化，每个门类既记不全也缺乏深度。应据实分类，适当减少层次，尽量扩



大竖写单元。

《北辰区财政志》中财政支出一章在编修初期分类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支出科目调整频繁，特别是2007年财政部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变化，进行财政收支科目改革，支出科目出现较大变化，有的科目改变名称，有的科目取消了，同时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科目，造成大部分科目不能从上限记到下限。参考外地志书，有的干脆设“2007年国家财政科目改革前财政支出”和“2007年国家财政科目改革后财政支出”为节题，这种按期分类立题显然违背了横排门类的原则，既会出现重复立题，又会造成缺失上、下限情况。后经反复斟酌，将60多年以来财政支出类目全部列出，没有变化的从上限记到下限，中途取消的从上限记到终结时，新设立的从设立时间记起，这样既符合了方志体例要求，又清晰完整的反映了北辰区60多年来财政支出情况，效果较好。

财政业务工作从大项上除了机构、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外，其他均属于财政管理，由于包含内容过多，极易出现不平衡。于是分设了税源建设与管理、预算管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会计事务管理、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与政府集中采购、农业财务管理、财政信用、（公社）乡镇财政和财政监督章，既门类清晰并保持了全书各章体量上的平衡，又有足够的空间分门别类进行记述。

### 三、“竖写”是依照时序完整系统的记述事物

怎样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竖写”呢？20世纪80年代首届新编地方志过程中，对竖写解释为“依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来写，包括发生、沿革、现状内容”。从整体上看，这一提法是正确的，但尚显抽象和笼统。要竖写好一个门类，

还要掌握竖写的具体要求。

1.依时记述。按照事物或事件发生、发展的前后顺序，采用顺序法记述，纵不断主线，这是志书“竖写”最基本的要求。倒叙、插叙是“竖写”的大忌。依时记述并不是指所有的事物都逐年、逐月、逐日的记，要避免“流水账”式的记载。应把握这样一个基本方法，即重要事物逐年记，规律明显的事物分段记，规律无常的事物择年记，发展渐进的事物跨年记。

2.单一记述。一事一记，一物一记，不离主线是竖写的另一个要点。每一个“竖写”基本单元（目）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只能记述同一类事物，不能记述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物，更不能离开主线旁生枝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叉，造成主线不清，层次不分，文笔混乱。但事物又是复杂的，有多个角度，要善于取舍，本着共性大于个性者合、个性大于共性者分的原则，凡具有共性的事物应集中在一处记述，这样既符合以类系事，同时又便于将同一类事物进行分析比较，全面系统的记述。

3.完整记述。对每一个“竖写”基本单元（目）要始末贯通，记述清楚事物的来龙去脉，兴衰起伏的主线，完整的反映事物发展的脉络和全貌，把握好“起点、转折点、终点”三个点。

记起点。首先记清一类事物的发端，该类事物是在什么背景下，什么时间出现的。一般指上限时间。

记转折点。任何事物都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经过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既有高峰也有低谷。某些事物虽没有大起大落，但是纵观几十年历程，变化也是很大的。以《北辰区财政志》为例，全区财政收入从五六十年代的吃饭财政到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再到2000年以后的跨越式发展。财政支出也随着收入的增加



而不断扩大，虽然一直以来坚持以农业、教育、卫生支出为重点，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很大的变化。如 70 年代以前财政支出数额较少，且主要为农业支出。80 年代始增加经济建设支出。2000 年以后增加城区基础设施投入。2010 年以后大幅增加民计民生投入等。客观历史是这样，反映客观历史的志书也应如实记述。小小一本志书，能够折射出宏观大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变化。

记终点。就是记述志书下限时间的情况。这个点很重要，既是“竖写”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与下轮志书的交接点，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已经消亡的事物要把结果写清楚，还在延续的事物则记清现状，给历史和读者一个内容

丰富而翔实的交代。

4. 点、线、面有机组合记述。点，就是以上说的起点、转折点和终点，还包括事物的重要节点、特点和亮点。线，是指事物发展的脉络主线，同时也是指时间这条线。面，是指事物的宏观、全面的面，也指记述的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横断面，这些都是“竖写”必须十分注意的。实践证明，采用点、线、面有机组合记述，不但能够清晰地展示事物发展兴衰起伏的主线脉络，而且能较好地彰显特色和亮点，增强记述的深度和广度。如果再配以完整规范的图表、照片，即文约事丰，节省版面，便于比较，相互佐证，直观生动，增强存史功能。

(作者单位：北辰区档案馆)

(上接第 13 页)

读书人，决不肯跑官要官，在家闲居了很长时间。阳休之了解到熊安生的情况，立即把他召进京城，并将其擢升为国子博士，使熊安生以及其他很多读书人都深受感动。

北齐孝昭帝高演当政时，阳休之任度支尚书。孝昭帝关心政务，肯于听取大臣们的意见，曾虚心向阳休之征询执政的原则和策略。阳休之出于忠心，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包括赏罚分明、严明吏治、禁止奢华、体恤百姓等等。孝昭帝对他的建议深表赞同，逐项加以落实，取得明显成效。

阳休之为人正直，办事公正，耻于趋炎附势、溜须拍马那一套。尚书仆射崔暹是文襄帝高澄亲自选拔重用的官员，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很多官员千方百计地巴结他，不是在他面前献殷勤，就是到他家里送礼行贿。阳休之对于这些官员的行为非常反感，不肯同流合污，连崔暹家的门槛都没曾迈过。

崔暹的幼子崔达擎很聪明，十岁出头就能作五言诗。众多朝官为了获取崔暹的欢心，无不啧啧称赞崔达擎，唯独阳休之一言不发。当时的北齐与南朝的梁国交好，梁国派使者来到北齐，驻在驿馆之内。崔暹在朝官们的怂恿下，想把儿子写的那几首诗拿到驿馆让梁国使者欣赏。阳休之实在忍不住了，严肃地说：“崔仆射的儿子的确很聪明，他现在写的诗与同龄人相比真的不错，将来有可能成为大器；但是仔细玩味，他的诗作还很幼稚，拿给外国使者去看，是要遭人耻笑的！”元景曾评价阳休之：“要论直言敢谏，没有比得上阳休之的！”

#### 参考资料：

- [1] 《晋书·卷一百九至一百十一·载记九至十一》
- [2] 《魏书·卷七十二·列传第六十·阳固传》
- [3] 《北齐书·卷四十二·列传第三十四·阳休之传》

(作者单位：民盟天津市委委员会)



# 明清时期漕运与天津

方兆麟

**作者按：**2006年5月和2007年12月我曾两次随全国政协组织的大运河申遗专家考察团全程考察了京杭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故道，收获甚丰。此后，开始深入研究大运河天津段的历史文化，从天津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战略角度考虑，曾多次向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呼吁要高度重视南水北调东线引水问题，以补天津地下水水资源不足之缺。这一愿望终于在2019年得以实现，现在天津每年能从东线引水中获得数亿立方水回灌地下，为天津长远发展提供了保证。恰逢今年是天津历史上第一次通漕740年（元至元十九年），故选择以前所摘抄明清时期运河笔记，写此小文以表纪念。

漕，《说文解字·水部》释：“漕，水转穀也。”意为由水道转运、传输粮食之意，故衍生出漕运、漕粮、漕渠、漕政等词。历史上，漕运是国家行为，历来受到高度重视。从水道运输粮食供应京师或接济军需，是国之重大要事。北宋神宗时高承所著《事物纪原》一书“利源调度”篇中记载：漕运“秦伐匈奴，令天下飞刍挽粟，此漕运之始也。”此事系指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命蒙恬征匈奴之战，由此可见，漕运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出现了。

天津作为“九河下梢之地”，周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河道和洼淀，这为天津与漕运密切联系起来创造了重要条件。天津是一个因漕运而

生的城市，虽然建城时间为明永乐二年（1404），但天津出现漕运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曹操为征乌桓，在今天津周边开挖了两条运河，即平虏渠和泉州渠，用以运粮和运兵。《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中记载：“建安十一年，曹操将击乌桓，凿平虏渠、泉州渠以通运。”《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十二卷中也有数条相关史料：“陈寿《魏志》曹太祖以蹋顿扰边，将征之，从泃口凿渠径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今无水。（《水经注》）”“原乌丸（桓）趁天下乱，破幽州，掠汉民合十万户，辽西单于蹋顿尤强，公将征之，凿渠自滹沱入涿，水名平卤（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三国志》）……按：泉州渠，当郦道元时，已称无水，今其故道久湮矣。”《地理百科》“古代泉州渠”条：泉州县是指今天杨村西南城上村；雍奴县东是指今武清区的东部地区。

## 一、明代漕运与天津

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底，直沽正式更名天津，并设卫筑城。运往北京的粮食仍是河海漕兼运，以海漕为主，先“以海运粮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装运至通州等处交卸”。为此，朝廷下令于小直沽建芦囤280座，约收粮11.4万石；在河西务建仓库160间，约收粮14.5万石。永乐三年，朝廷令总督粮储官于天津卫城北造露囤1400所。这年，漕运南粮创“支运

法”，又名“搬运法”，这种方法类似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的“交公粮”，先由粮户自备船只，运送到各指定地点仓库，再由各卫所官军分段接力，依次运送北京，军民分任其劳，每年4次。通州与北京间的一段，由天津、通州等卫派人接运。永乐六年，海漕运粮65.12余万石；永乐十二年，海运41.48余万石，河漕45.28万石。

由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在河南原武（今原阳县西北）决口，将会通河淤塞，会通河废弃。至明永乐九年（1411），明成祖朱棣采纳了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他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人<sup>[1]</sup>负责施工，征发山东、徐州、应天（南京）、镇江等地30万民夫服役。主要工程为改进分水枢纽、疏浚运道、整顿坝闸、增建水柜等。

改进分水枢纽，主要是将元代济州河在济宁任城分水，改为在运河“水脊”南旺分水，从而解决了以前向南水量偏多而向北水量偏少的弊端，使南旺分水成为运河南北分水的水利枢纽。具体做法是在戴村附近的汶水河床上，修筑一条新坝，将汶水余水拦引到南旺，注入济州河。济州河北段随着水量的增多，通航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后来人们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且比较彻底的改造，将水源丰富的汶水，全部引到南旺分流，并在河道上建了南、北两坝闸，可以有效地控制水量，使水量南流三分，汇入泗水；北流七分，注入御河。人们戏称为：“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从而解决了卫河运道水量不足问题。

与此同时，重新疏浚了河道，将被黄河洪水冲毁的运道异地重新开凿，旧道由安山湖

（今东平湖）西面向北注卫河，新道则改从安山湖东面向北注卫河。东面地势低于西面，便于将湖水引入运河。同时加宽加深了河道，解决了重载漕船通行问题。为了更好地调剂会通河的水量，宋礼等人“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增设了水柜，即为运河蓄水的湖河，用于为运河补水。由于南旺是“水脊”，向北至临清运道长300里，地降90尺；向南到镇口，运道长290里，地降116尺，宋礼等人在元代所建13座闸坝基础上，又新增建了闸坝7座，进一步改进通航条件，使通航能力大大提高，运量从几十万石猛增到数百万石。利用闸坝的避闭解决通航中的水位落差问题，充分体现了古人在水利工程方面的智慧，因而会通河有“闸漕”之称。据文献记载，明宣德七年（1432），漕运南粮总数高达670万石，超出永乐年间平均数额一倍多。

会通河重新开通后，到永乐十三年（1415）朝廷下令罢海漕，改河漕，京杭大运河正式通航。从此大运河正式成为漕运和沟通中国南北最为繁忙的水上交通线。天津作为这条交通线上连接南、北运河和海上运输最为重要的枢纽城市，又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为天津快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元代海漕是由船户承运，官方给予运费（脚钱），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给中统钞八两五钱，其后递减，至于六两五钱。以后因海漕风险太大，又对海路较远者的运费不断增加，到延祐元年（1314），路程远者运价达到以前的五倍左右。到了明代，漕运制度不断完善，从由下至上制订了一系列制度。如明永乐年间，成祖皇帝朱棣非常重视漕运，所定漕运制度涉

[1] 《明史稿》记载：“于是命礼及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往治之。”



及方方面面。据文献记载：“漕有定卒，居有常糗，运有行粮，米有定数，数有加耗；领有长，长有总，载许私以济其费，道设医以察其病，无外征，无他役，其优恤之典，可谓至矣尽矣。无事则操舟而运饷，有事则可列伍而水战，寄危于安，藏兵于食，是则又祖宗法外之微意也。若夫经历坝、闸、浅、洪，则又有徒役，时备以济其不虞。卒凡十有二万，而徒役亦岁有四万七千余人，暂发者不与。其统领者，则曰老人，曰总小甲。”<sup>[1]</sup>按规定，当时天津三卫<sup>[2]</sup>每卫各设千户一员，共有旗军364名，浅船37只，每年运粮11191石。平均每船约10名漕卒，运粮300余石。<sup>[3]</sup>

另外，对储粮敖仓、漕粮转运等也有明确规定，如：“在京、通者，则有总督、太监、户部尚书或侍郎，巡仓则有御史，拨粮则有员外郎，监收则有主事，以至仓使、攒典，各有人焉，所以统储天下之粟，以资国用也。在淮、徐、临、德者，监收则亦有太监，有主事，以至仓使、攒典，亦各有人焉，所以分贮天下之粟，以待转运也。及后转运变为兑运，又变为长运至今……”“兑运法”是宣德六年（1431）开始实施的，即以民运粮储，在瓜州、淮安兑于军运，这个方法实施后官民两便，很受欢迎。“长运法”是明成化七年（1471）九月开始实施的，即命运军径赴江南水次交兑，即到各漕运码头收购漕粮，然后径运天津、通州储粮仓交卸。后数年，淮安、徐州、临清、德州诸仓奉命一体遵行，长运法成为漕运定制。入清以后，

仍沿用明代由屯丁长运法，后逐渐改为长运法与兑运法并行。《清史稿·漕运》中记载：“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长运。长运者，令瓜、淮兑运军船往各州县水次领兑民，加过江脚耗，视远近为差。而淮、徐、临、德四仓仍系民运交仓者，并兑运军船，所谓改兑者也。”

明成祖朱棣为了保证京师漕运畅通，建立了专门护卫漕运的运军，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京操十二荣<sup>[4]</sup>，军有十二万；漕有十二总，军亦有十二万。”可见当时漕运系统之庞大。但队伍大了出问题也在所难免，特别是漕运运送的是粮食，中途被盗、被私自贩卖，或与地方势力暗中勾结，贪腐贿赂、盘剥克扣、造假账、私粜粮、以次充好等等时有发生。为此朝廷也制定了很多严格的规章制度。例如：“运粮把总指挥千百户等官，索要运军常例银两，及科索军士财物至十两以上者问罪，各降一级；二十两以上者降二级；三十两以上者降三级；至四十两以上者，仍降三级，发回本卫带俸差操，再不使用。其跟官书算人等，指称使用等项，科索军士银物，侵欺入己至十两以上者，拿问边卫充军。”再例如：“每粮船一只，许带土宜二十石。又见行事例内一条，漕运船只除运军自带土宜货物外，若附搭客商势要人等、酒、面、糯米、花草、竹木、板片、器皿等货物者，将本船运军并附带人员参问发落，货物入官。其把总等官有犯，降一级回卫，带俸差操。”这些还是比较轻的，更严重者还有很多，但罚不胜罚。另外，民间船只与漕船争运道、过闸等

[1] 《漕运通志·漕卒》卷四。

[2] 即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

[3] 明成化七年朝廷定每年运京师漕粮400万石，其中北粮75.56万石，南粮324.44万石。此后以为常例。清顺治二年仍依明制，定每年输京漕粮400万石，用四百料浅船12104只，每船运正粮330石，耗米132石。

[4] 荣，指明代藩王。

而发生争斗事件也屡见不鲜。

为了加强管理，明代多次调整漕政设置，到明中期左右，“以济宁、东昌、天津三兵备道奉勅带管河政，凡事与北河分司会议呈请，其文武官属，郡有丞判，州有通判，县有簿尉，闸有官，卫有指挥，所有千、百、户，各守其疆，不相渝越”。<sup>[1]</sup>天津所管运道由天津兵备河道防政（或副使）常驻天津管理，下有：天津卫管河指挥一员、天津右卫管河指挥一员、天津左卫管河指挥一员。宣德十年，户部在天津设立分司，派户部主事一员驻此监督、管理仓储收放事宜。在天津左卫署旁增置三仓：大运仓储属天津卫，共6廒30间；大盈仓储属左卫，共9廒45间；广备仓储属右卫，共7廒35间。这些仓储于崇祯末年毁于大火。

这里顺便说一下明代的“海禁”政策。元末明初，由于日本国内封建诸侯割据混战，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明洪武四年（1371）起，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政策，在打击倭寇的同时，对本国商人出海经商采取了严厉禁止措施。这个政策始于明初，直到明末始终未撤销，但其间时严时松。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由于海漕的需要，在海禁方面有所放松，但朱棣也三番五次地训诫沿海地区商民：“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这也是明代在永乐年间修通会通河后，立即停海漕改河漕的重要原因。

万历二十二年（1594），朝廷鉴于天津邻近北京，又是漕运要冲，为了防备倭寇，决定从天津、河间等卫防边官军内选精锐，与北调的

3000水兵南北兼练，与陆营兵3000成掎角之势；并在武清、杨村等沿河地方，增立保甲、墩堡，加强天津防务。

入清以后，顺治九年（1652）清廷裁天津左卫、右卫归并天津卫；雍正三年（1725），升河间府所属天津州为直隶州，下辖武清、青县、静海3县。但直到雍正八年，才从武清县划入143村；从静海县和沧州划入119村；原来散在各地的天津卫属屯庄，就近划归各州县。同年，以吏部左侍郎刘於义为直隶河道水利总督，内阁学士徐湛恩协办河道事务，并设天津河标营，分左右两营，左营由副将统领，有马兵113名，守兵441名；右营由游击统领，马兵80名，守兵272名，专司防河。雍正九年（1731），清廷以天津直隶州为水陆通衢，五方杂处，事务繁多，升直隶州为天津府，附廓置天津县。天津府辖天津、静海、青县、沧州、南皮、盐山、庆云1州6县。旧设河间府海防同知，改属天津府。改梁城所为宁河县。

## 二、清代漕运与天津

清朝，让历代皇帝日夜殚精竭虑的国家要事有两件，一是外防沙俄和西方列强的掠夺，二是内保漕粮收兑和运道通畅，这是关系国运的重中之重。纵观大清近三百年历史，就漕运而言，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漕政，二是河工，三是运道。

### （一）漕政方面

为了确保漕运畅通无阻，明清两代几乎是不计成本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给以保障。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专门设置了两套直属中央的运河管理机构——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入清以后对运河的管理比明代进一步加

[1] 明·谢肇淛撰著：《北河纪》卷五。



强，漕运管理系统和河道治理系统职责上更加分明，制度上更加规范。顺治初年，清廷设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各一名，作为负责漕粮运输和河道治理的最高行政长官，正式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纳入官制，二者官秩均为正二品，兼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者为从一品。漕运总督以下之设官有巡漕御使、督粮道、管粮同知等，所辖军队称“漕标”。河道总督所属机构，乾隆以后定为道、厅、汛三级，分段管理。属官有河库道、河道、管河同知、通判等，所辖军队称为“河标”。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衙门内均不设属官，只设书吏 20 人，办理衙门内一应文牍事宜。两总督虽各有专责，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障漕运畅通，因此双方是分工不分家。正如乾隆帝所说：“两督事虽异，一漕事本同。”清代漕运总督衙门仍驻淮安，管辖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具体负责漕运、检选运弁、漕船修造、查验回空、督催漕欠等事务。从漕粮收缴、起运，到漕船北上过淮、抵达通州，漕督都要亲自稽核督查，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情况均需随时向皇帝报告。康熙二十一年（1682）规定，粮船过淮后，总漕应随船北上，率所属员弁视察运道情况，调度全漕。粮船过津后，总漕即入京觐见述职，而后回淮办理下年之征收起运诸事。

由于漕运从粮食征收到装船运输，再到斤两成色验收、过淮盘验、过闸剥浅交费，再到交卸等全程各个环节，都有利可图，到清代嘉道年间后，漕运腐败愈演愈烈，从漕政官吏，到沿河地方官员，再到闸官漕吏、运丁水手等，营私舞弊、盗换冒充、骗瞒勒索、故意延误运期等等，各种手段应有尽有，尽管朝廷不断严

令督查，但防不胜防。例如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上谕严禁盗卖漕粮，“山东、天津、通州粮艘经过及停泊地方，著各该巡漕御史实力稽查，毋任运丁等致有盗卖米面之事，以清积弊”。又如，道光六年五月，天津北仓未经起运漕米 10 万石出现霉变，道光帝令穆彰阿查办，追查结果系仓吏于丰等人受贿收贮湿米所致。命将于丰杖 100，流放 3000 里。

## （二）河工方面

由于黄河夺淮到清代已有四五百年历史，泥沙淤积导致的河患频发，使运河治理面临死结性难题，特别是南河黄、淮、运交汇处的清口一带，河工任务特别艰巨。这是河工问题到清代时期频发、治理任务繁重的重要原因。中国从远古大禹治水时期，就懂得清浊分流的重要性，到元代开始开凿京杭大运河时，水利专家们就充分利用清浊分流来解决河道畅通问题，清入运，浊入淀，减轻河道淤垫。但黄河决口北移，洪水失控狂泄，使清浊分流难以完全控制，运河河道淤垫变浅在所难免，经年累月，到了清代已成顽疾，故年年都得花大把银子进行治理。因而清代河道总督比漕运总督更受重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清廷对河道总督的重视远胜明代，总河（即河道总督简称，下同）地位渐渐凌驾于总漕（即漕运总督简称，下同）之上。明代总河职务形同虚设，而清代总河一职从未空缺，而且总河代理总漕事务者很多，总漕兼理河务的现象却很少。二是总河面对河患难以根治的局面，河道总督（特别是南河总督）往往如履薄冰，突发的河患常常会使他们丢官获罪。正如清末两广总督周馥在其《国朝河臣记》序中所言：“河益高，患愈亟，乃罚日益以重。嘉道以后河臣几难幸免，其甚

者仅贷死<sup>[1]</sup>而已。”

河工之事涉及漕运民生，但由于运河是分段治理，清代总河的设职情况要比总漕复杂得多。顺治元年（1638）只设河道总督一人，掌管黄河、京杭大运河及永定河堤防、疏浚等事，治所在山东济宁。随着江南河工兴举日多、修守事务渐趋繁巨，康熙十六年（1677），河道总督衙门不得不由济宁迁至江苏清江浦（淮安市）。这样一来，河南武陟、中牟一带堤工若有险情，驻扎淮安的河道总督往往鞭长莫及。清廷于雍正二年（1724）设立副总河一职，驻河南武陟，负责河南河务。雍正七年（1729）改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江南河道总督或南河总督），副总河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河东河道总督或东河总督），分别管理南北两大河段河道事务。遇有两处共涉之事，两位河督协商处置。雍正八年（1730），清廷以直隶河工关系重大，设直隶河道水利总督一员，驻扎天津，专司河务，管辖海河水系各河及运河防治事务。至此，清代河道总督一分为三，而就河工任务及对漕运的影响来看，三总河中地位最关紧要的是南河总督。乾隆十四年（1749），直隶河务渐趋正轨，北河总督一职遂被裁撤，其职能由直隶总督兼任。

### （三）运道方面

由于清中叶以后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因此运道问题表面是运输方式的转变，实质上也是漕政面对时局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清初，由于继续实行“海禁”政策，漕运按明代长运法仍为河漕，至嘉庆年间由于运河浅涸，运力受到影响，于是有人提出改为海漕，两江总督勒保等人会奏皇上，提出不可改海漕而废河漕

12条理由，“上谓：‘海运既多窒碍，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万一贏绌不齐，惟有起剥盘坝，或酌量截留，为暂时权宜之计，断不可轻议更张，所谓利不百不变法也。’自是终，仁宗之世，无敢言海运者”。<sup>[2]</sup>其实，早在清乾隆四年，朝廷已解除了商船从奉天向天津运米的“海禁”，以解决漕运不足。乾隆八十月，乾隆帝又批准大臣、水利专家高斌奏请，放弛奉天海禁，准商民贩运米谷流通，接济天津等处民食。“自奉旨之日，至次年秋收为止。”至道光四年，吏部尚书文孚等请引黄河入运，但是道光帝深知黄河挟沙，引黄入运日久会产生淤垫，借黄济运并非上策，于是诏两江总督魏元煜等人入京筹议恢复海运之事。但诸臣都怕惹事，以交通阻碍不能入京。后大学士孙玉庭借黄济运导致漕船阻滞，延误运期，皇上震怒。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并说：“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霉湿侵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寡，价不待筹。……不变通将何策之从？臣以为无如海运便。”道光帝大喜，下诏令有漕各省大商议英和的建议。时两江总督琦善，安徽巡抚陶树，都奏请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皇上乃派布政使贺长龄亲赴海口，督同地方官吏招徕商船，并筹议剥运兑装等事，并下令在上海设海运总局，在天津设海运分局，命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津验收监兑，“以杜绝经纪人需索留难诸弊”。实行了数百年的官办漕运，至此改为商运，实为漕运史中破天荒的重大变革。这

[1] 免于一死之意。

[2] 《清史稿》食货志·漕运。



次承担海运商船，是租用英商太古洋行的轮船。以后，英商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又开行了上海至天津的客货轮船航班，定期往来于津沪两地。

《清史稿》中写道：“道光六年正月，各州县剥运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兑，分批开行。计海运水程四千余里，踰旬而至。米石抵通后，转运京仓，派步军统领衙门文武员弁沿途稽查。”“承运漕粮每石给耗米八升，白粮耗米一斗，以补正米之不足。仍将漕运商耗核出二成，白粮核出三成，由津局给价收买，随正交运。”“沙船余米不下十万石，初照南粮例，听天津人照市价收买。嗣以商人希图贱债售卖，改由官为收买，其价银由江南委员转发船户，后仍令商船自行售卖。”由官而商，官督商办，其结果是官商两利。以后每次海运，沿海水师提镇，各按汛地派拨哨船兵丁，巡防护送，并派武职大员二人随船赴津。后来宁、沪商人还各自购置火轮船一艘，用于沿海巡防。

咸丰三年（1853）因运河浅涸，船行受阻，河漕从此停运并废。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不久被裁撤。

至同治七年（1868），海运局试用夹板船装运所采买的米粮，运至天津紫竹林交卸后，由商董就近存入粮栈，由验米大臣会同通商大臣验收，所需小船剥价、栈租、挑力，每石给银七分，由商董承领经理，又每石给保险银三分。同年，因“津沽河面狭隘，常有沉船失米之虞”，在大沽增设了海运外局。

同治十一年（1872），浙江巡抚杨昌浚奏请用轮船运漕粮，得到朝廷批准。由商人朱其昂从清政府借领20万串钱为资本，在上海创立了轮船招商局，经营盈亏由商人自己承担。朱其昂此前在天津创立了三津磨房，开天津电力面

粉加工之先河。他创办轮船招商局时，购买了轮船三艘，政府每年拨江、浙漕米20万石，由招商轮船海运天津。轮船到津，由江、浙抚道运通交纳，由直隶总督筹办剥船转运，并会同仓场侍郎临栈查验。轮船协运江、浙漕粮时，米袋之上写明“某省漕白粮米”字样。粮米上栈时，由海运沪局派员监兑，兑竣，即由轮船商局给收米回文，以后装船起运俱由招商局核办，沪局不再过问。其栈费夫力，亦由商局负责。漕粮派装轮船时，轮船商局委派执事会同沪局详验米色、干湿清洁度后，方可收兑，交轮局押赴浦东东栈过秤核收。抵津后，津局各员董提前验收，以免壅滞。“轮船每艘载米三千石，填发连单，由津局稽核，一切领银领米等结悉罢之。轮船运米，由填给免税执照，并援例得酌带二成货物。其洋药及二成之外另带货物，仍须纳税。”

到同治十三年（1874），朝廷准江西在沪采买漕粮80000石，交招商局由海运抵津，每石脚价银二两七钱。光绪元年（1875），湖南漕粮采办正耗米20345石，湖北采办30000石，均交招商局由海运抵津。江西、湖南两省停漕。后虽有人提出恢复河漕，但同于海运之利已受到普遍认可，恢复河漕之议作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京津沦陷，在清江浦设漕运总局，及至两宫西逃，漕运局移至汉口，清江浦局改设分局。同年，部分漕粮改用火车由天津运往北京。

以国家为主导的漕运，作为历史的产物，曾为历代历朝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兴盛、民生的保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功不可没。运河因漕而生，漕因运河而兴，二者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永载史册。

（作者单位：天津市政协文史委）

# 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初期的斗争历史

张连亭

192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第一个地方组织——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当时，天津共有共产党员7人，青年团员45人。<sup>[1]</sup>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在中共天津地委的领导下，天津党团组织不断壮大，革命形势持续高涨。

## 教育工人 唤醒民众

中国共产党初期工作的重点是城市，是工人。为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个月后，即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是北方工业重镇，“劳动组合”北方分部工作的重点就在天津。天津地委委派安幸生同志担任劳动组合天津支部书记，并对工运工作做了周密安排和具体分工：由李震瀛、王仲义负责铁路工运；李志新负责印刷行业工运……李培良、卢绍亭等同志负责纺织行业工运。当年，天津的纺织行业有6大纱厂，是工人相对集中的地方，也是天津地委工作的重点。接受任务后，李培良等同志对几家纱厂进行了考察。天津的6大纱厂数裕元纱厂<sup>[2]</sup>的规模最大，裕大纱厂和宝成纱

厂<sup>[3]</sup>的位置最偏僻，都在河东郑庄子。几位同志做了分工，李培良为总负责人，并分管“宝成”和“裕大”两个纱厂。

李培良<sup>[4]</sup>毕业于天津商业学校，是天津本地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当年才22岁。跟工人打交道对李培良来说是个新课题。如何才能大量接触工人，并尽快把他们组织起来呢？他们借鉴了安体诚<sup>[5]</sup>的经验——办平民学校。1924年9月的一天，几家纱厂的大门口同时贴出了招生广告：平民学校现招收工人学员，学校免收学费，并无偿提供课本文具。李培良选定的校址在郑庄子大街庆元里。1924年“双十节”过后，庆元里平民学校开学了。很快，河西藕耕里平民学校也开学了。“你织布，我纺纱，赚钱都归资本家。生活苦，做工忙，兄弟姐妹要自强……”这就是平民学校的课文，都是老师自己编的。为了体现通俗性和趣味性，老师们还为教材设计了许多漫画。例如，一座“金字塔”，最底层画得是工人，上边一层是资本家，再上边是贪官污吏……塔尖是帝国主义。这样的教材道理深刻，通俗易懂，工人喜

[1] 董振修：《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早期革命活动》，天津政协文史资料，第10辑，第8页。

[2] 地点在河西小刘庄，新中国成立后为国棉二厂。

[3] 两个厂于20世纪30年代合并，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国棉三厂。

[4] 后担任北京市委书记，1931年病逝。

[5] 1921年9月，安体诚受李大钊委派，到天津开办“工人工余补习学校”，地点在河北宇纬路东兴里，一年后，工人学校被当局查封。



欢看，愿意学。

平民学校架起了共产党与工人群众沟通的桥梁，效果非常好。平民学校发现和培养了许多人才，像河西的司福祥、郭起春，庆元里的姬兆生、沈玉山等等。

### 组织起来 开始斗争

1925年初，在卢绍亭、司福祥等同志的努力下，裕元纱厂摇纱车间工会成立。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这也是天津最早的工会组织。工会成立不久就显示出了威力。裕元纱厂发薪，工人们要排大队等着领工资，厂警要“维持秩序”。这次，厂警又发现有人“不规矩”，先是破口大骂，接着上去就打！往常，工人挨了打还得低三下四地装孙子。这回可不同了，挨打的工人是摇纱车间的，工会负责人孙树宗出来制止，厂警当然不听，还口出狂言进行威胁。孙树宗一声令下，摇纱车间的工人冲上来，将厂警团团围住。厂警吓坏了，夺路而逃，工人们紧追不舍。厂警跑进办公楼，工人就堵在门口……最后是人事科长杨筱泉出来解决问题。他向工人们承诺，马上开除打人的厂警，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工人们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很快，细纱车间、粗纱车间……的工会组织相继成立。<sup>[1]</sup>

裕元纱厂的革命形势也带动了其他纱厂。尤其宝成纱厂，几位积极分子摩拳擦掌，李培良也决心加快工作进度。他马上找姬兆生、沈玉山、董召义谈话，介绍他们入党。1925年初，这三位同志成为天津最早的工人党员。入党后，三位同志全力以赴筹备工会工作。他们

用滚雪球的方法，先发展一批积极分子，然后让这些积极分子再去发展新的积极分子……宝成纱厂工会于1925年4月成立，一步到位，一上来会员人数就达上千人。紧接着，中共宝成纱厂党支部成立，这是天津地方党组织的第一个基层党支部。党支部成立之后，马上研究斗争问题，以工会的名义向厂方提出三个条件：一为恢复被削减的工资；二是设立女工喂奶间；三为工会俱乐部提供用房。

“宝成”的经理姓吴。一开始吴经理用拖的方式，今天说要请示总经理，明天讲正在研究。三天之后工会没有得到答复，全厂开始罢工。这下吴经理慌了，他找来一位资格比较老的女工头，让她代表厂方去跟工会交涉。工会也讲究斗争策略，他们向厂方提出：必须由经理亲自出面解决问题，而且要签字画押。吴经理害怕耽误生产，更怕出乱子，他“屈尊”与工会联系，接受工会的条件。

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工会在宝成纱厂已成为公开的“合法”组织。工人们热情高涨，会员人数增加了许多！此后不久，宝成纱厂又进行了两次罢工斗争，均取得了胜利。<sup>[2]</sup>

“宝成”工人的斗争，促进了天津革命形势的发展。随后，北洋纱厂、恒源纱厂、华新纱厂的工会组织相继成立。192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津各界举行游行集会，有两万多工人参加。劳动节过后，天津各行各业的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如星火燎原，势不可挡！

### 团结互助 共同革命

宝成纱厂的工人运动风生水起，而与它一

[1] 司呈祥：《参加天津早期革命活动的回忆》。

[2] 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沽上春秋——河东党史资料汇编》。

路之隔的裕大纱厂却没有一点动静。在庆元里平民学校的学员中，开始只有贺志一个“裕大”学员，可时间不久就被厂方开除了。

裕大纱厂的情况比较复杂，老板是日本人，<sup>[1]</sup>但实行的是封建式管理，总工头赵魁高是青帮“老头子”，各车间大小工头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他们对工人严密监视，动辄打骂、甚至开除。贺志就是因为“工会的事”而被开除。日本人要杀一儆百，赵魁高一伙也耀武扬威，工人们敢怒不敢言。纵有千难万险，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李培良召集“宝成”等几个纱厂的工会代表开会，请他们帮助裕大纱厂打破僵局，成立工会。沈玉山提供情况说，裕大纱厂有个项瑞芝，四个哥哥都是“裕大”的工人，人称“项家五虎”，在工人中挺有威望。还有他父亲，在工房包伙，非常便于开展工作。<sup>[2]</sup>等到下次开会，沈玉山把项瑞芝请来了。会议开始前李培良先与项瑞芝谈话，会议开始后，工会代表各自介绍本厂成立工会以后的情况。项瑞芝被感染了，他在会上表态：有“劳动组合”撑腰，有兄弟厂工会帮助，我还有嘛可担心的？回去后我就立马开展工作。<sup>[3]</sup>按照李培良的安排，项瑞芝先找到贺志，然后再与父亲、哥哥商量。父亲和三个哥哥完全赞同，只有二哥反对。项瑞芝一边做二哥的工作，一边在父亲的伙房里开展工作。项瑞芝还把李培良请到伙房，跟工友们见面。很快，就有100多名工人在成立工会的文书上按了手印。裕大纱

厂率先在织布车间建立了工会组织。时间不久，厂工会也成立了，总负责人就是项瑞芝的大哥项瑞成。<sup>[4]</sup>

裕大纱厂成立工会之时，正是“五卅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五卅运动”爆发后，天津地委组织各界民众积极响应。6月10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救国日报》创刊。6月14日，联合会召开声援大会，天津各界200余个群众团体参加。大会选出邓颖超、江浩、安幸生等人为请愿代表。大会结束后，10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游行示威，并到公署衙门请愿。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市民捐款。当时数学大师陈省身正在扶轮中学上学，他也跟着毕业班的同学去募捐。可是，大街上到处都是募捐的学生，陈省身他们只好去相对僻远的北仓。在北仓的大街上，陈省身带头演讲，他们共募得捐款703.89元。<sup>[5]</sup>艺人金月梅同女儿金少梅在“东天仙”举办募捐义演，将收入全部捐给上海工人。在她们的感召下，艺人慷慨献艺，市民踊跃捐款。为此，上海工人专门在《申报》上刊登感谢信，感谢天津人民的慷慨义举。

“五卅运动”促进了天津工人运动的发展，到1925年7月，天津已有纺织、地毯、油漆、烟草、印刷等二十几个行业成立工会。1925年8月6日，天津市总工会成立，安幸生为第一任委员长（主席）。

[1] 裕大纱厂原为中资股份制企业，后因向日本东拓公司借款，最终无法按期归还，按照约定，东拓公司遂接管企业。

[2] 司呈祥：《参加天津早期革命活动的回忆》，天津政协文史资料，第10辑，第76页。

[3] 司呈祥：《参加天津早期革命活动的回忆》，天津政协文史资料，第10辑，第77页。

[4] 项瑞芝：《记1925年砸裕大事件的前前后后》。

[5] 扶轮中学校史。



## 高潮迭起 轰轰烈烈

裕大纱厂是日资企业，而“五卅惨案”就是由日本老板枪杀中国工人造成的。五卅惨案对“裕大”工人的震动最大。在裕大纱厂与日本人开展斗争，是对“五卅运动”最强有力的支援。天津地委决定抓住时机，掀起全市工人运动的新高潮。为了保障斗争的胜利，地委做了精心准备，首先加强行业工会的领导力量，推举姬兆生为纺织行业工会负责人，建立裕元、裕大、北洋、宝成四厂工会联盟。在紧急情况下，做到一厂有事，三厂支援。正当李培良与“裕大”工会代表研究斗争方案时，“宝成”那边出事了，女工余阿英被工厂开除了。工人们一面为她鸣不平，另一面也担心这种事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人心浮动，大家要求工会为余阿英做主，为全体工人做主。地委决定，派安幸生同志跟厂方交涉。在安幸生与厂方交涉的同时，厂工会积极配合，最终厂方接受“调解”，余阿英恢复工作。宝成纱厂的危机解决之后，裕大纱厂的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安幸生深入裕大纱厂，会同李培良以及工会代表一起商讨斗争问题。他们给厂方列出几项条件，即：为工会提供用房；8小时工作，4小时学习；吃饭时间由20分钟增加为1小时；增加工资；招收和辞退工人必须经过工会……随后又增加两条：给贺志恢复工作，让上海的日资纱厂复工。厂方回复：前面的可以商量，后几条做不到。日本人顽固不化，工会决定，罢工！1925年8月11日，大队军警开进裕大纱厂。厂区内外，全副武装的军警三步一

岗五步一哨。工会赶紧向上级汇报。地委指示，罢工按计划进行，并通知宝成、裕元、北洋三个厂的工会，立即前去支援。下午5点，项瑞成、张瑞生等工会代表走出车间，准备去会场。军警上来阻拦，抡起枪托就砸，项瑞成和王惠民（纠察队员）当场被砸伤。工会代表和纠察队员开始反抗，双方扭打在一起……在这紧急时刻，罢工的铃声响了，工人们冲出车间，闯出工房，汇入到反抗的人流之中。与此同时，宝成纱厂支援的队伍到了，本厂上夜班的工人也回来了。而工厂大门紧锁，他们就推倒了一段围墙，高喊着、怒吼着，涌进厂区。军警吓坏了，四处逃散。几个打人的军警跑进公事房，工人们紧追不舍，把公事房砸得稀巴烂，把里面的日本人和反动军警打得屁滚尿流。有十几个军警躲到机器房，工人们把机器房包围，军警开枪了……项瑞芝对大家高喊：工友们，我们怕死吗？大家齐声回答：不怕！项瑞芝一挥手，不怕死的上！<sup>[1]</sup>工人们一拥而上，打得打，砸得砸，反动军警狼狈逃窜，工人占领了工厂。此时，“裕元”和“北洋”的支援队伍也到了。李培良召集“工会联盟”代表开会。大家认为，日本人和军阀当局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要主动出击，给当局和日本人施加压力。会议最后决定：明天4个纱厂的工人在“裕大”集中，而后到督府衙门去请愿。

转天早晨，近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沿海河出发。当请愿队伍走到河沿街时过不去了，前面有军警，路中央有障碍，后面还架着机关枪。怎么办？走在前面的工会负责人冲大家

[1] 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沽上春秋——河东党史资料汇编》，第29页。

喊：“前边的路已被封锁，大家说，咱们是退回去呢？还是冲过去？”队伍里发出山呼海啸般地回应：“冲过去！冲过去！”<sup>[1]</sup>随着呼喊，队伍像潮水一样向前冲……军警开枪了！机关枪冲着人群扫射，埋伏在附近的军警像饿狼一样扑过来……事后得知，军阀当局派了一个旅的兵力，还有警察。这次惨案有 20 多名工人牺牲，伤者无数，还有 500 多人当场被捕。<sup>[2]</sup>紧接着，大搜捕开始了——安幸生被捕了，李培良被捕了，还有项瑞芝、姬兆生、司福祥……全都被捕了！

### 柳暗花明 再创辉煌

1925 年 12 月，国民军与奉军开战，国民军很快打到杨村，兵锋直指天津。国民军总指挥冯玉祥向往革命，同情工人运动，天津地委审时度势，决定配合国民军占领天津。为此，天津总工会成立了武装纠察队，地委还在津南建立了“华北农民自卫军”。两支队伍遥相呼应，给奉军造成了极大压力。奉军害怕后路被切断，仓皇撤退，纠察队顺势占领督府衙门。12 月 25 日，国民军进驻天津。第二天，安幸生等所有政治犯被全部释放。

天津工人配合国民军占领天津有功。趁此机会，天津地委以总工会的名义与国民军交涉，提出了“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等项要求。1926 年元旦，天津总工会率先亮出牌子。紧接着，天津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反帝同盟等进步团体都挂出牌子，公开活

动。历史证明，国民军进驻天津期间，是民主革命时期政治环境最好的阶段，天津民众在中共天津地委领导下，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最大限度地开展革命活动——1926 年 1 月初，《工人生活》恢复出版、《救国日报》复刊。1 月中旬，天津总工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工人夜校开学。1 月 21 日，地委在平安影院召开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赵世炎在会上讲话。会议结束前由地委妇女部长赵达教唱《国际歌》，这首全世界无产者的战歌，还是第一次在天津的公开场合唱响！……3 月 12 日是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纪念大会在南市召开，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和中央特派代表谭平山出席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做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演讲。国民军派来军乐队以壮声色。但出现了一个遗憾，本来组织者安排军乐队在会议开始时奏哀乐，会议结束前奏《国际歌》。可是，由于没有现成的五线谱，乐手们又没接触过《国际歌》，最后只好作罢。

那段时间，许多大中学校都开办红色讲座，编印革命刊物，共青团员人数也增长到 174 人。工会组织发展的势头最为强劲，1926 年初的会员人数已达 3.3 万人，还有 10 万工人与工会有密切联系。<sup>[3]</sup>

### 逆境出击 夺取胜利

1926 年 3 月，奉系军阀卷土重来，白色恐怖笼罩津城。为了重振革命士气，地委决定组

[1] 司呈祥：《参加天津早期革命活动的回忆》，天津政协文史资料，第 10 辑，第 79 页。

[2] 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五卅风暴中的宝成、裕大纱厂》。

[3] 董振修：《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早期革命活动》。



织一次罢工斗争。地委对前一段的工人运动做了总结，决心力保罢工成功。地委安排：一是罢工斗争选在北洋纱厂；<sup>[1]</sup>二是不搞全厂性的大罢工；三是条件只提一条，增加工资。

8月30日斗争开始，工会向厂方提出要求，厂方置之不理。按照计划，粗纱车间开始罢工。罢工当天，资方勾结军警，将粗纱车间工人代表刘文秀等三人逮捕，并威胁说：如有怂恿罢工和领头者，一律逮捕法办。按照地委的计划，如果粗纱车间的罢工不起作用，细纱车间就接着罢工，以此类推。可是，细纱车间工人代表李凤岐胆怯了，没有下达罢工命令，致使粗纱车间孤立无援。厂方正在酝酿新的反扑，罢工斗争面临失败的危险。下班后，工会负责人司福祥等人去地委汇报。地委指示，马上安排摇纱车间罢工，并且要造出声势。第二天上午，摇纱车间开始罢工。摇纱车间在罢工之前即成立了党支部，在支部书记郭起春的带领下，工人们拿起铁棍、榔头，一边敲打机器，一边高呼：“释放工人代表！增加工资！”摇纱车间规模大、工人多，敲打声和呼喊声震动了全厂！总经理吓坏了，以为一年前的“砸裕大”事件再次发生了，赶紧将司福祥、刘元昌等工人代表请到经理室谈判。这时，两个罢工车间的工人围在办公楼下，高呼口号。总经理吓得发抖，终于服软了。最终，三位工人代表被释放，资方答应给每位工人提高百分之十工资。北洋纱厂罢工取得胜利。<sup>[2]</sup>

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在反革命的屠刀下，大批革命者惨遭杀害。仅半年时间，全国共产党员就从57967人<sup>[3]</sup>一下锐减到不足10000人。天津同样处在白色恐怖中，反动军阀<sup>[4]</sup>与国民党反动派遥相呼应。1927年8月，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等同志被捕，英勇就义。同年11月，傅懋恭（彭真）接任天津地委书记。此后，天津的革命形势又进入新的阶段。

天津早期的革命斗争是残酷的、悲壮的，同时又是成功的、卓有成效的。它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树立了榜样，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也在中共党史和天津革命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砸裕大”“闹宝成”已成为历史专有名词，那些参加斗争的革命先驱们，永远为后人纪念和敬仰！

#### 参考资料：

- [1] 《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早期革命活动》，董振修，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2] 《参加天津早期革命活动的回忆》，司呈祥（原名司福祥），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3] 《沽上春秋——河东党史资料汇编》，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 [4] 《记1925年砸裕大事件的前前后后》，项瑞芝，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扶轮中学校史。
- [5] 《五卅风暴中的宝成、裕大纱厂》，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 [6] 《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供稿单位：河东区地方志办）

[1] 地点在河西挂甲寺，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四新纱厂。

[2] 司呈祥：《参加天津早期革命活动的回忆》。

[3]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一章，第32页。

[4] 当时京津一带还在军阀张作霖的控制之下。

# 抗战前十年天津对外贸易与居民消费习俗观念

史宇飞

1927 年至 1936 年的 10 年间，全面抗战尚未爆发，国民政府出于维护统治需要，出台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全国对外贸易比较活跃。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传播和欧风美雨的阵阵袭来，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社会生活不断受到冲击与挑战，新的消费风俗与观念在变革中传播。

天津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和中西方文明交流、碰撞与融合的窗口，成为近代消费生活方式变革的前哨，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等的变革与革新最为突出。随之带来的就是深层次的变化，即人们在中西贸易的交流中，吸收、借鉴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等，有选择地加以吸纳，舶来的近代文明日渐渗透到千家万户，中国传统的消费生活方式扬弃地变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态下，虽然对外贸易带给中国的并不是完全平等有利的变化，但它也给中国的某些方面带来发展与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理念。

## 一、近代天津的对外贸易情况

开埠后，天津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经过八九十年的历程，到 1936 年前后，发展成人口超过百万、市区面积增加到 147.83 平方公里的近代大都市，成为中外贸易通商大港与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口岸及国内外商品集散的重要市场，同时也成为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 （一）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遍布全球

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兴起发展，天津同外界的联系由内向型向对外贸易发展，贸易关联的国家和地区从 10 余处发展到百余处。

最初与天津有外贸关系的国家是英、日、俄、越南、菲律宾、朝鲜等，贸易的国家不多，地区也有限。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伴随航海技术和运载工具的革命，近代天津外贸国家和地区遍及全世界，从而大大提高了天津在世界的知名度。

以远洋交通改善为例。随着 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欧亚两洲航程缩短 7000 公里。伦敦到上海从 2.25 万公里减到 1.77 万公里。<sup>[1]</sup> 贸易周期由一年缩短为半年，使天津同欧洲及地

[1] 张丽等：《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视角：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瑞士、意大利、奥地利、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埃及等国家具备了发展贸易的条件。太平洋邮船公司开辟每两月一次从旧金山到上海的航线之后，日、美间又实行了联营。继之太平洋航线的开通及货船的增多，天津同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智利、阿根廷和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有了发展贸易的条件。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通车和经巴尔干半岛通往欧洲国家和地区的铁路接轨，天津同东欧、北欧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发展贸易成为可能。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又为天津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提供了发展贸易的条件。

## （二）近代天津成为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天津对外贸易的特点是间接贸易为主、直接贸易为辅，其间天津在世界各国贸易份额的影响微不足道。

20世纪以来，天津外贸迅速发展，各国同天津的贸易也成为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1931年为例，天津对外贸易在各国对华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为：加拿大12%，法国17.59%，日本25.1%，德国10%，俄罗斯25%，美国23%，丹麦31%，阿根廷13%，澳大利亚28%，意大利21.9%。<sup>[1]</sup>

## 二、对外贸易与近代天津新的消费习俗

任何消费经济活动都是依据一定的生活、生产条件而产生，并受一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制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洋货的不

断进口与流行的大趋势下，天津形成一种新的商业氛围与环境，使人们的消费习俗出现了新变化和新趋势。

### （一）消费结构的改变

对外贸易的发展，为天津带来千姿百态的中外商品，各类新奇的洋货更使人们眼界大开，新的消费需求也改变了原有的消费结构。

**洋布西式服饰深受欢迎。**进口的洋布种类多样，价格也有很大优势。在这一时期，从外国输入的洋布主要有白花布、袈裟布、罗布、印花标布、各色标布、玄青义大利布、素地绵羽绫、素地色布等。<sup>[2]</sup>国外采用机器生产洋布，规模大、效率高、成本低，导致洋布价格比那些主要靠人力和手工作坊生产出的土布要有明显的价格优势，深受民众喜爱。

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天津居民服饰也在逐步西化。西式服装以简洁、灵活、方便的特点迅速被接受并流行。西装、大衣、西帽、革履、手杖等，夹鼻眼镜一副成为一种时髦派范。各个社会阶层，即便在一些穷乡僻壤也不能免俗，人们服饰的西化程度得到了不断提高。崇洋的服装消费，成为中西贸易交流中西式生活对中国国内日常消费冲击的一个缩影。服装成为一个窗口，展现了天津人追求个性自由的千姿百态。同为通商口岸的上海，标准的绅士需要一套三件头西装，因此，在“只认衣衫不认人”的上海社会，银行职员、大百货公司店员等再穷也要“淘”一件二手西装。

这一时期，在西风东渐影响下，天津女性服饰得风气之先，节奏变化加快，向现代化多

[1] 王方中：《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2] 丁日初等：《对外贸易同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关系（1843—1936）》。

元化趋势演变。不仅是欧美的服装，连日本和式服装中宽袖对襟的妇女外套也很受某些名媛和太太的欢迎，成为她们的晚礼服。

**西式建筑形式被吸纳。**西式建筑在国内流行，最早是从租界开始的。近代天津租界云集，各国建筑风格迥异，各具特色。近代天津的建筑风格深受西方影响，在被称为金融街的解放北路，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分布在此，街边密布高大的西式楼宇，古典风格、俄罗斯风格、巴洛克、拜占庭和现代主义风格，豪华凝重，丝毫不逊于上海外滩，也展示出天津人内敛而不外露的性格。

这一时期，一些失意的政客、军阀和寓公来到天津，斥巨资盖起一座座小洋楼。天津小洋楼建筑多为折中主义风格，在装饰上采用中西混搭，自由随意。如很多建筑既有西式半圆穹顶、欧式雕栏，也有中式凉亭、门钉石狮子，别出心裁却又浑然一体。天津作为中国北方城市，在历史上曾经包容了江、浙、皖等地区的民居文化，近代又包容了以欧式风格为代表的小洋楼文化，而且将其融合为具有天津特色的“津派文化”，<sup>[1]</sup> 这是一次重要的变革，使天津的城市面貌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当前很多城市建筑规划往往走入“千城一面”的误区。天津的小洋楼建筑群是近代天津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并成为今天独特的一道风景线，留下了天津中西方文化交融碰撞而产生的独有的历史遗迹。

**交通方式有了根本变化。**这一时期，中国的交通方式西化趋势也不断加强。新式交通进

入中国多是洋人强力输入的，中国人在认识到其便利之处时才开始接受使用。对一般民众影响最大的新式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和汽车，而对国内外商品运输起着重要作用的就是轮船和火车。

据统计，1932年天津自行车拥有量达到50000余辆，经营自行车的车行就有30多家。<sup>[2]</sup> 1903年，天津街头出现了汽车，到了20年代，天津租界赛马场外面经常停着几十辆小汽车。街头也时有交通事故发生，一些富豪人家用小汽车作为嫁妆配送。这一时期，天津共开设七条有轨线路，约25.3公里，遍布旧城区和租界。

这一时期，天津的轮船航运业发展十分迅速，1936年前后进出天津的海轮吨位已达数百万吨。海轮航运逐渐成为天津与秦皇岛、烟台、青岛等沿海港口城镇之间的重要交通线。从事海轮航运的各轮船公司先后开辟了多条以天津为起点，途经青岛、烟台、秦皇岛、龙口等港口的航线。天津一方面通过海轮航运沟通了与沿海港口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借助便利的铁路运输和发达的内河航运加强了与华北内地城镇的联系，海轮航运与铁路、内河航运等的相互补充，成为华北城镇网络变动的交通基础。在铁路方面，由于天津“扼六路（京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青济）之中心”，所以是华北铁路网络的中心节点之一。随着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天津与京奉路沿线的秦皇岛、唐山、廊坊，津浦路沿线的杨柳青、静海县城、独流、兴济、德州，京绥路沿线的张家口、丰镇、平地泉、大同，京汉路沿线的石家庄、郑州，胶

[1] 汪静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

[2] 张利民主编：《城市史研究》（第3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济路沿线的济南、青岛等一大批城镇之间的交通更加便利。<sup>[1]</sup>

**日常消费品中洋货比例增加。**西方的物质文明向世人展现了其无限的魅力。天津居民很快接受了来自异域的物质文明。这一时期，一些生活实用洋货，特别是一些物美价廉又经济实用的低端日用洋杂货（包括仿洋货），日渐普及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的基本取代了原有土货而成为人们的日用必需品。进入人们生活的洋货不仅数量大增，而且种类丰富多样，几乎遍及人们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常见的生活日用品如火柴、洋灯、钟表、棉布、衣服、帽子、毛巾、手帕、纽扣、洋针、颜料、纸烟、蜡烛、香皂、香水、玻璃镜、洋伞、纸类、文具、机械类、皮包等。

这一时期，西式餐饮打破了中式餐饮一统天下的格局。到30年代，天津西餐馆多达38家，咖啡馆、糕点店等有18家之多。西餐不仅影响了天津居民的饮食消费结构，也使餐饮观念得到了改良，如妇女也可以参加宴会，情人约会去起士林成了新风尚，时人诗云：“别时密定来朝约，座假中街起士林。”汽水、啤酒产业也得到了发展，《大公报》上经常刊登天津明星啤酒的广告。1935年，天津有75家饮食工厂，其中就有多家汽水厂，知名的品牌有万顺、光明、鸿兴等。

**多元文化不断融合并逐步繁荣。**天津近代城市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融合、渗透的结果。二三十年代，租界与华界进一步结合，伴随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西方文化对

天津城市社会的影响愈来愈大。这一时期，报刊出版业空前活跃，各种报刊杂志纷纷设馆创刊，街头报刊叫卖声不绝于耳，据统计当时在天津的报刊达31种，《大公报》《益世报》影响力遍及全国。二三十年代，文化艺术一派兴旺，形形色色文化流派纷纷出现。30年代话剧演出也达到高潮，造就了一批艺术家。如曹禺的《日出》《雷雨》，在当时的戏剧界引起轰动。推广传播文化的机构如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也有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显著的特点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领域，相互影响，各自找到存在价值。如在音乐方面，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的《紫竹调》，丝竹乐队演奏管弦乐，中西掺杂的音乐风格为城市增添不少色彩。<sup>[2]</sup>

**消闲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多彩。**娱乐业的繁荣以剧场的发展为标志。1931年4月，天津市区有各种娱乐业场所102处，除了传统的戏院、说书场、茶社等传统娱乐场所外，还有舞厅、酒吧、球场、游艺场等西式娱乐场所。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是电影院。电影是西方传入的各种娱乐方式中最为大众所接受的娱乐形式。1928年，电影业在天津迎来大发展时期，到1934年时，天津的电影院达到21家。有声电影在英租界的平安影院首次放映，其后大量国产影片纷纷推出，《渔光曲》在法租界影院放映百场，场场爆满。

跳舞和赛马在天津风靡一时。租界内既有供外国人娱乐的酒吧，也有提供给中国人的舞厅。1931年，在日租界的巴黎舞厅开业，灯红

[1] 陈争平：《中华民国史》第三册志二，四川出版集团，2006年版。

[2] 田仲一：《中国戏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酒绿，富商巨贾流连于此。赛马最初是英国人组织的，一度排斥中国人，随着租界中国人势力的增加，一些买办成了马球会的董事，在城郊建立了专供中国人娱乐的赛马场。天津上流社会人士一掷千金，每到赛马季，赛马成为各大报刊和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 三、对外贸易与新消费观念的建构

对外贸易不仅带来形形色色的商品，还有西方的消费理念，这都对千百年来受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影响而形成的传统消费理念产生巨大冲击，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得到了一次重构。

#### (一) 崇洋消费与讲求虚荣

这一时期，新奇而质优的进口货受到天津居民的青睐，经营洋货的商店越来越多，洋货店中的商品琳琅满目，全面、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构成了现代化、城市化的重要元素。高端洋货往往质量上乘、样式新潮，恰好迎合了天津上流社会炫耀性消费的强烈需求。富人是洋货消费的引领者和主导者，民众则势必仿效之，但他们财力无法与那些富人相比拟，于是就选用价廉物美的洋货。各阶层从洋货的消费中得到不同的物质与心理的满足。

就消费资料和消费结构而言，西方商品几乎渗入了中国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进口商品的不断渗透，为崇洋提供了物质基础。近代天津的崇洋风气与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传播是互为表里，轨迹相同的。五光十色的洋货背后其实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这对习惯了农耕文明的国人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人们追求、模仿，形成超越现实生产方式变革的

崇洋社会风气。这种风气使社会生活甚至出现“以洋为荣”和超前消费的奢靡之风，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社会心态。

#### (二) 国货消费意识与爱国主义

在对外贸易发展中，国民的“国货消费意识”也逐渐增强，它蕴含着特殊的爱国情怀。西方商品的倾销，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本就基础薄弱的本国民族工业，引起国人的焦虑，呼吁消费国货的呼声逐渐达成共识。国货消费被看成爱国，消费洋货则是一种堕落的表现。《益世报》曾对不消费国货、醉心洋货的现象抨击道：“国人受资本主义之流毒，醉心洋化，发展物欲，以奢靡相竞尚。”

二三十年代，为抵制外货、提倡国货，天津政府与民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设立国货年、开展国货展览会，以求养成人们消费国货的习惯和增强国货消费意识。国货的消费政治化，消费国货不仅仅是一种消费行为，而是涉及国家与民族大义，民众把爱国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天津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发展工业、提倡国货为宗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货运动，民众也积极配合，民族工商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如宋棐卿创建东亚公司，生产“抵羊”牌毛线，其意为抵制洋货；天津恒源、裕元等纱厂生产的棉纱代替日本的棉纱；天津造膜公司的肥皂和广生行的产品，代替国外化妆品。<sup>[1]</sup>由于社会的共同努力，国货的消费有所增加，天津的民族工商业也相应发展。这一时期，中国近代的经济民族主义逐步从非理性向理性过渡。在对待中外贸易的冲突中，不再盲目抵制外来商品的销售，而是兴起实业救国的

[1] 李正中：《近代天津知名工商业》，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热潮，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国家也加强了各方面建设，以生产本国产品，减少外国洋货的大量倾销。

### （三）早熟消费与享乐主义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消费主义的思潮伴随着外来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的渗透，在国民中开始逐渐出现了一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作为中西交汇的通商口岸城市，天津和上海一样，成为北方地区追求新奇、时髦、摩登和领先时代潮流的地方。在物化环境达到较高水平后，人们就会注重精神的追求，从而改变旧有的生活观与价值观。商品成了地位、财富、生活方式和生活品位的象征，其符号价值被凸显为最重要的东西，其使用价值被忽视。

天津的富贵阶层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一种享乐主义的消费心态，攀比之风日盛。面对日渐盛行的奢靡与享乐，虽然大众媒体批评，有识之士谴责，政府也力图通过行政手段改变这种不良的趋势，但人们内心的禁欲主义一旦解放，就很难再返回原来的状况。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种经济繁荣是虚假的繁荣，社会财富的增长也不是自主的增长，这种病态经济繁荣下的超前消费和过度奢靡，其消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 （四）开放意识与求新慕异

在对外贸易的影响下，人们开放意识和接受新事物能力不断增强。笔者认为，这一时期重义轻利、重农抑商、黜奢崇俭是中国传统经济主流意识。对外贸易发展以后，逐利、重商与高消费的流行，传统的消费习俗等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居民在消费上求新慕异，追求时尚。

以服饰为例，对外贸易活跃，各式西洋衣

料都可以在天津市场上买到，人们对服饰的追求转向多样性和个性化，以新奇独特为时尚，不仅色彩艳丽，款式复杂，而且装饰新颖，用料考究。传统的维持生存的单一消费，变为多元的追求个性解放的多元消费，中西模式消费交融，西方的现代消费观为人们普遍接受。

### （五）消费等级观念的破除

消费观念的变化引发了以往旧的等级观念的更新。民国以后，天津近代工商贸易更加发展，消费大众化和世俗化趋势明显，传统的消费等级观念也被打破。

封建社会的生活消费是等级化的，国家用法律制度来固定物质消费的等差，衣食住行的消费首先是法律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在极小的意义上才是个人兴趣和经济支付能力的问题。以前社会政治地位决定物质消费品的等级，而现在消费主要凭借经济实力，只要有足够的收入来源，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消费品，尤其是那些代表西方文明的进口高档品。在新的环境下，消费观念的变化影响到人们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复杂化、多样化和个性化，消费生活进一步走向大众化、平民化。在外来因素的冲击下，等级化对人们的精神禁锢逐渐被化解，原来被制度和意识形态禁锢的衣食住行越来越自由化。在对中国传统消费观念的否定中，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对利的偏重，重利、唯利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取向。这些思想意识的出现，表明伴随着物质消费的变化，消费理念也在变化与重构。这种重构对于中国近代消费观来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对近代消费观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作者单位：市档案馆年鉴指导部）

# 一门三进士 清正传世家

吴振清

明朝初年，牛咤子村隶属静海县归德里，1962年从静海县划归天津市西郊区，如今隶属西青区精武镇。

据《牛氏族谱》记载，历史上“牛氏本隶秦中陇西郡，唐肃宗徙燕居方城，即今之固安县。以氏志其乡曰牛咤。方今数万丁，称北燕巨族。宋南渡后方城沦于金、辽，地当孔道，差务浩繁。始祖厌其纷扰，乃携孥迁于瀛海之北鄙，度形窥势，卜于宽河之左侧，筑茅茨数椽栖焉”。<sup>[1]</sup>

秦中陇西郡，现在的甘肃省东南部，牛氏家族从甘肃迁徙到河北省固安县，在辽、金政权的统治下，苦于应付差务，再次往滨海地区迁徙，来到静海县一带“宽河之左侧”，“查其土可耕，其水可钓，无饥寒之累，而有室家之安，生全之乐，遂定居于斯。且袭固邑之村名，以名其村数椽之庐为牛家咤”。在静海择地而居，后仍称村落名字牛家咤，至今牛咤子村境内还有宽河古河道。

## 一、牛氏家族弃武习文

牛氏家族在这里子孙繁衍，枝繁叶茂，逐渐发展，并且族人“亦知就学”，读书学习文化。清朝初年以来，树立“重文兴家，清正传世”的家风，嗣后曾经有三人高中进士，多人

考中举人，家族兴旺。牛氏家族被列入“静海八大家”，与高、元、李、励、边、杜、萧氏并列名门望族。

明朝初年发生的“靖难之役”引起北方各地动荡，民众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也为这个家族生活带来变化。“明时靖难兵经咤村，用为向导，同事者十（原文阙）隶其下，阙后录功，授以总旗冠带世职，赡以土田四十亩。”“传至守坤公行六者，勇健精骑射，飞鸟走兽箭无虚发。赴部投职名授为选锋，因点视不到落职，归农土田，世守如故。……至本朝顺治五年含章公讳文炳者得入县庠，是为书香之始。”<sup>[2]</sup>传到牛守坤这一代还是习武传家，失去官职以后便回乡务农，世代耕种为业。一直到清朝顺治五年（1648）牛氏族人牛文炳进入县学成为生员，“敕赠文林郎”，标志着“读书有成”，从此其族人勤奋读书，努力向学，“书香传世”。

牛氏家族经过“弃武习文”的转变，不断取得成就，到康熙年间牛天宿科举登第之后，科甲连绵，出现了三位进士。

## 二、牛氏三进士

牛氏家族实现了弃武习文的转变之后，族人秉承了“重文兴家，清正传世”的训条，读书进学，学有所成，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

[1] 《牛咤子村志》（志稿），引牛思永《牛氏族谱序》。

[2] 《牛咤子村志》（志稿），引牛思任《书咤村牛氏族谱叙后》。



先后三人高中进士。

### (一) 三进士仕履

牛天宿（1644—1736）字戴薇，号青延。康熙二十六年（1687）中举人，在静海县创立文社，以提升乡邦文化，培育人才。嗣后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中癸未科三甲第五十二名进士，授任广西柳州府融县知县，历任吏部主事、河南辉县知县、河南同知、雍正甲辰科河南考试官。上司重其才能，遇有艰难事项常委他办理，邻县有疑难事件往往向他咨询。因有惠政，当地民众为之立德政碑。

牛思任（1692—1782）字巨膺，号伊仲。牛天宿之子。由附学生中康熙甲午科举人，转年考中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科三甲第一百三十七名进士，授江西建昌府南城县知县，雍正时历任安徽宁国县知县、河南卫辉府滑县知县，调补开封府县尉氏县知县。在他任职期间，县内河道淤塞，他亲率民众浚河筑堤，兴修水利。虽然辗转多地任职做官，但是牛思任“为官清廉，不收馈遗，告归后两袖清风，依然寒素”。

牛思凝（1703—1755）字方岩（或作严字），号裕川，牛天宿之子。由廪膳生中雍正乙卯科（1735）副榜，乾隆元年丙辰科举人，十年（1745）乙丑科二甲第十二名进士。初任山东肥城县知县，十三年调任诸城，十七年以卓异升贵州正安州知州，转普安州，二十年升黎平府分驻古洲镇（今贵州省榕江县）理苗同知、大定府知府。引见进京，随后回乡扫墓，病故。

三人仕履分别见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畿辅通志》《静海县志》《山东通志》等书，

和涂小元《明清时期天津现辖五县（区）进士名录》一文。<sup>[1]</sup>

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之前，牛氏家族中多人应试中举，或授以教职，或出任知县。

### (二) 诗文著作

三位进士均有诗文传世，据族谱和传记记载，牛天宿勤于著述，作有《周太师尚父钓台庙碑》等诗词杂文百余卷，著《谦受堂文集》《谦受堂诗草》传世。牛思任作有《清河迎驾》等诗文，牛思凝所作诗文亦多，他的诗反映了边疆地区风土风貌，读起来别具一番特色。三人所作文赋等篇什文字过多，不便全录，兹选录三人数首诗歌如下。

#### 牛天宿《雪夜遣怀》（选录二首）<sup>[2]</sup>

善世奇方祇闭门，无边心事向谁论。  
逢人竟厌须眉古，到处虚推行辈尊。  
送腊可无瓶内酒，迎年自有栅中豚。  
老夫卒岁惟需此，此外经营任子孙。

爱文习气与年增，团坐诸孙共一灯。  
辨字老如知路马，开宗仪比放参僧。  
诗缘抱病闲三日，酒为冲寒加半升。  
自笑书痴痴到底，百无求处百无能。

#### 牛思任《和高毅斋重阳后十日，同元允修游西山，喜遇阿云举作》<sup>[3]</sup>

官散多暇日，秋光牵我情。  
郁彼西山侧，峰嵒互纵横。  
重阳去未远，天地亦寥清。  
折简招名流，携壶出凤城。

[1] 《天津史志》2000年第2期。

[2] 《谦受堂诗草》卷二十八。

[3] 《国朝畿辅诗传》卷三十。

杳杳翠微巅，沈沈落雁声。  
芸阁香案吏，异境恰相逢。  
把袂寻幽讨，偏觉步履轻。  
漱齿青石涧，摩崖自记名。  
登高乘酒兴，一啸谷风生。  
真源何处是，为我问崆峒。

### 《清河迎驾》<sup>[1]</sup>

阳春初应律，圣主豫游回。  
日暖沙堤净，风微彩仗开。  
鸾旗翻树影，豹尾映河隈。  
东顾瑶台近，西瞻碧岫来。  
卿云叶凤管，紫陌驯龙媒。  
大化征民俗，订謨重睿裁。  
八方歌乐只，多士庆康哉。  
虎拜千官肃，南山献寿杯。

### 牛思凝《仲冬山行纪事》（选录二首）<sup>[2]</sup>

#### 一

峻岭寒烟三两家，天风吹动草堂斜。  
行人正苦重裘薄，袒臂苗娘汲水花。

#### 二

老树凌霜叶未凋，俨如松柏励清标。  
争知蛮女怀春约，解向山间赠翠翘。

### 《者那山行》——从普安赴乡

暮起炊烟一缕斜，万重深树有人家。  
崎岖拔草寻荒径，踏遍山山黄玉花。

### 《昭通道中》

三年踏遍夜郎溪，又向滇南听晓鸡。  
秋水乍漂红叶冷，寒山自绕白云低。  
人逢旷野初开眼，马到平沙欲放蹄。

万里飘蓬燕市客，故乡风景动栖迷。

### 《送李云卜同门》

十年兰谱秘鱼笺，东武初攀翰墨仙。  
国手医余张仲景，醇醪醉汝李青莲。  
夹香书舍留诗草，半月山房列绮筵。  
回首只今成往事，当时同在大罗天。

以上诗歌见于《晚晴簃诗汇》《国朝畿辅诗传》《津门诗钞》《静海县志·艺文志》等书。<sup>[3]</sup>

### 三、牛思凝二三事

牛思凝在山东诸城做官时期，他的作为对当地发生过很大影响，有的被地方文献记载，有的被民众传诵。

#### （一）重修钟楼

牛思凝由山东肥城知县调任诸城知县，他勤政为民，办了许多实事，民众念念不忘。例如，重新修建钟楼，并载入《诸城县志》。

“逮乾隆十六年（1751）知县牛思凝重修，南仍旧额曰‘迎晖’；颜其北曰‘冠盖里’，盖取襄阳里名，僻县人文之盛也。门上作新亭，悬古铜钟。从明正德十六年知县韩肇毁楼，逮乾隆十六年，整二百三十一年。”<sup>[4]</sup>

牛思凝重修钟楼，不仅恢复传统而修建建筑，更多的是寄托了对当地文化兴盛希望，对人才郁起的期盼。“冠盖里”是古地名，《水经注》中记载说：湖北宜城县的太山下有座庙，汉代末年有名士在这居住，乘坐“朱轩华盖”（有高贵身份者方可使用）的刺史等许多官员聚集于此而得名。他借此来鼓励当地读书人见贤思齐，勤学上进。钟声悠扬，催人奋进。诸城文脉，绵延不息。

[1] 《牛屯子村志》（志稿）文化卷。

[2] 《晚晴簃诗汇》卷七十九。

[3] 所列诸书收有三人诗作，如《津门诗钞》卷二十一，收牛天宿诗三首，牛思任诗二首，牛思凝诗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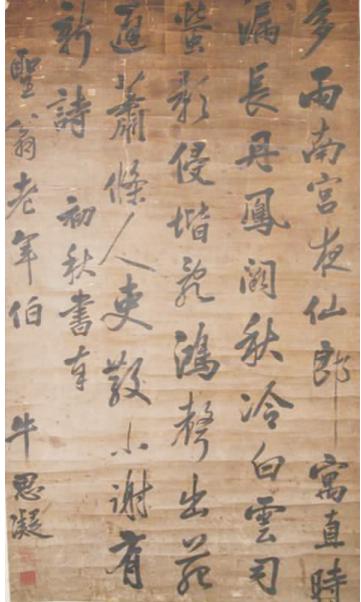
[4] （乾隆）《诸城县志·建置考第四》。



## (二) 牛思凝的书法

牛思凝的书法作品，目前未见族人有收藏和记述，流传于世的仅知收藏家赵仲泉曾经购藏过一件。

“记得在 1985 年去安丘，有友人荐我去看一个收藏家的藏品，因在头一天的晚上看了歌颂牛思凝的新剧《三升官》，知牛思凝是个翰林，曾任诸城知县。”“因那时资料稀缺，藏家不知牛思凝为何人，就以较低的价格买了回来。”<sup>[1]</sup>



牛思凝书法作品

这段文字“赵仲泉于 2014 年 8 月 13 日写于昌邑”，作品是一件中堂，尺幅比较大，悬挂不便，但可从中领略到牛思凝书法的浑厚气象。

## (三) 戏剧 《三升官》

牛思凝在诸

城任职期间，关心民众疾苦，抑制豪强，不惧权势之家，得罪了权倾朝野的刘墉家，为此远调云南。他的远离也获得了民众的同情、怀念和歌颂。

据山东人民传诵和牛氏族人相传，知县牛思凝征收皇粮，得知京官刘墉家向来不纳粮，地方官不敢征，牛思凝认为应该官民一致，遂对刘府征粮。消息传到刘墉那里，自然恼恨这个不识时务的地方官，明为褒奖迁升官职，实则远远调往云南。山东民众遂编演了戏剧《三

升官》。

剧情梗概是：牛思凝征粮不畏权势，得罪了朝廷吏部尚书刘墉，于是挟私报复，明升暗降。一年内连升三级，由山东诸城升迁到贵州，又从贵州升官到辽东，从辽东再到陕南，终年奔波忙碌在赴任跑路上，俸禄积蓄花费得一干二净。他最后看透了官场黑暗与玄机，毅然挂靴归里。<sup>[2]</sup>

赵仲泉先生记述说：前一天刚看过《三升官》演出，转天竟然购得一幅牛思凝书写的中堂挂轴。可见此剧久演不衰，至今仍然出演于舞台。

## 四、文脉绵延 人才辈出

牛氏家族三百年来重视教育、文脉绵延。在清朝可谓“科甲鼎盛”，其后的时期在文化事业上依然人才辈出。<sup>[3]</sup>略述如下：

牛天曜，字景碧，号垞村，康熙四十七年（1708）举人，吏部选授正定府晋州学正。

牛思永，字振誉，号慎轩，雍正七年（1729）举人，授广平府鸡泽县教谕。

牛天垣，字贲苍，号华野，雍正十年（1732）举人，授山东肥城知县。

牛元靖，字舆直，号翼亭，乾隆元年（1736）举人，吏部拣选知县。

牛元颖，字遂铎，乾隆举人，授顺德府沙河县训导，调任湖南衡洲府清泉县知县。

牛广泽，乾隆二十三年（1758）举人，任正定府教授。

牛思涛，字东暄，号丹崖，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授广平府曲周县教谕。

牛广宣，乾隆二十六年（1761）举人，授雄县、吴桥县教谕。

[1] 见“360 个人图书馆《牛思凝书法鉴赏》”。

[2] 《牛垞子村志》（志稿）附录卷，牛福通整理《敢于担当的牛思凝》。

[3] 《牛垞子村志》（志稿）人物卷·人物传略。

牛元藻，字芳溪，号希梁，乾隆举人，吏部选授东明县教谕。

牛曾庆，字奕卿，乾隆三十五年（1770）举人，授顺天府三河县训导。

牛曾受，字令宣，号对峰，乾隆三十五年（1770）举人，补授东明县训导，升平山县、邯郸县两县教谕，大名府河间府教授。

牛曾若，乾隆三十六年（1771）举人，大挑补授湖南泸溪县知县，转任郴州武冈州知州，再转清泉知县，历年积案如山，遂清理判断，不数月四境贴服。为官清明廉洁，尝言：作为官吏当化大事为小事，化有事为无事。后因年老改任教职。

牛曾承，乾隆四十四年（1779）举人，吏部拣选知县。

牛曾省，字鲁庵，乾隆举人，赠登仕郎。

牛曾谋，字贻孙，乾隆举人，授任丘县训导。

牛元察，字子同，乾隆举人，候选训导。

牛元蕙，字馨谷，乾隆举人，候选训导。

牛曾诏，字凤衡，嘉庆九年（1804）举人，吏部拣选知县。嗜好读书，冬夏不辍，不喜做官，终生课子训徒，培育后辈。

牛广宣，字召来，国子监中举，候选训导。授雄县、吴桥教谕。

牛曾恕，字一轩，嘉庆举人，候选训导。

牛广士，字国宾，号济廷，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历任任丘县训导、昌平州学正、宣化府教授。晚年应聘主讲静海瀛海书院，敦品励学，教书育人，门下英才辈出。平生诗文著作甚多，因兵燹而散失。

牛广甸，字昌策，道光二年（1822）举人，授平谷县教谕，正定府教授。

牛积昌，字孟博，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吏部候选训导。

牛积中，道光举人，候选训导。

牛积礼，道光举人，挑取眷录。

牛广勋，字策云，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候选训导。

牛积厚，字履安，咸丰年间举人，授山东武城县知县，高唐州知州。

牛葆衡，字星北，光绪年间武举人，在保定武备学堂军科毕业，任炮兵团长，代理江西督军，南昌戒严司令。

牛氏族人在科举中有成就者，大多数都是从事教育事业，担任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一类的教职。

在文化事业上也不乏建树者：

牛树荣，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曾经协修《静海县志》，为地方志编纂工作做出过贡献。

牛星垣，曾任静海县执行委员，书法造诣颇深，尤其擅长楷书，担任过奉系军阀的“书写”职务。

牛福鑫，曾经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1928年与沈慧儒（沈钧儒之胞妹）等同人创立了浙江中小学（解放后更名天津二十中学，河北路小学）。回乡后又创建静海县瀛海中学（以后更名静海一中），任董事长兼校长。毕生从事教育事业。

牛星丽（1928—2009），1947年进入天津艺术馆学习油画，1949年入北京华北大学美术科学习西画，六十年代随名画家许麟庐学习国画，又跟丛清伯学习山水画，卓有成就。在学校联欢会上显露出表演天赋，遂调入戏剧科。1952年进入北京人艺，从事表演，先后出演了《虎符》《骆驼祥子》《茶馆》等剧。在《末代皇帝》中成功塑造了张谦和一角，获得第九届“飞天奖”最佳男配角奖。后主演了《龙嘴大茶壶》，1992年举办了个人画展，是位群众喜爱的表演艺术家。

（供稿单位：和平区档案馆）



# 无极拳在天津的传承与发展

韩武喜 吴俊侠

## 一、无极拳的起源

无极拳起源于清朝中期的乾隆年间，迄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创始人为江南乐府县人氏刘仙岛。清嘉庆年间，刘仙岛将无极拳传于河南苔头人蔡锦堂。蔡锦堂又传天津人王玉珍，王玉珍再传天津人徐永庆（光绪年间四品带刀护卫），徐永庆又传到天津市高铠庭已是第五代。2009年，天津市无极武术被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无极拳”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 二、无极拳的传承与发展

### （一）创办天后宫“无极国术研究社”

高铠庭（1913—1976），原名高登武，无极武术第五代传人，著名武术家。1931年，高铠庭在天后宫创办“无极国术研究社”以报效祖国。无极国术社自1931年成立到1966年关闭历经35年，授徒1万多名，其中有不少社会名流和时代精英，在天津武术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950年，天津武术运动委员会成立，高铠庭任常务委员，继续置身于天津的武术事业，为天津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铠庭出生于天津市河北区东窑洼的一个没落家族。艰苦的家庭生活磨炼了高铠庭的意志，从小养成了不怕吃苦的精神。9岁时，高铠庭叩头拜徐永庆为师，开始了练武生涯。刻

苦勤奋自不必说，每天早晨五点钟，他必到河东武圣庙跟师父练功。从大虹桥西于庄的家，徒步走到今天的河东区大直沽武圣庙，需要很长一段路程，即使是成年人都很吃力，更何况是八九岁的孩子。如果碰上阴天下雨，就更加不能预料了。这样一次两次不足为奇，而要坚持10年不间断就不简单了。今天回过头看，他过人的意志品质，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到十四五岁时，他所学套路和功夫都有了长足进步，徐师父见他进步如此之快，就有意将他携至东沽拜见师爷王玉珍。一天，徐师父带着他去东沽，拜谒自己的师父、无极门第三代掌门人王玉珍。王师爷是天津武术界有名的“杆子王”，一生习武授徒，擅长揣骨相术。他看到高铠庭身材雄伟，仪表堂堂，又让高演练几趟武功，看罢更是从心里喜爱有加。看到自己的嫡亲徒孙功夫如此扎实，“无极”后继有人，喜不自禁。于是和徐永庆师父相商，将这个徒孙留在自己身边，亲自教授三年。自此，成就了高铠庭师父、师爷“双传艺”的美名。高铠庭跟王玉珍师爷练功夫，除点拨技艺外，更主要的是了解天津武术界的掌故秘闻，包括各门各派代表人物的功夫窍要所在，极大地开阔了视野。

高铠庭十六岁时，师父年事已高，就让他替教。虚十九岁这年，恩师徐永庆对高铠庭说：“我在这教功夫数年，也没正式场子，更

没创立招牌。你留神给自己立个像样场子，把咱无极门功夫传下去。”高铠庭没有作答，暗自记在心里。这一年正赶上天津召开武林盛会，高铠庭表演了一趟龙形掌。与会者都是武术界的行家里手，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高铠庭的心与意合，意与力合，力与气合，手眼身法步赢得了行家们的认可。无极门讲究“腿是迈跟腿，步是趟泥步，力是三节力”，快慢有序、式式到位，每个细节都交代得特别清楚，收式行礼、气不长出，更是赢得了满堂彩声。这次大会上高铠庭还遇到了一位伯乐，那就是武林盛会的参与者之一，天津宝华金店的掌柜王少山先生。会后，王少山找到高铠庭，并告知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精武会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上，亲自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技击有益于身体，且科学昌明。长枪大炮必有失恃之日，国人不可不重视国术，短兵相接时，技击之能尤为重要。”这番话对高铠庭是极大的鼓励。攀谈之后，王少山问高在哪教场，高如实以告尚无正式地点，王少山便主动推荐天后宫。征得徐师父同意后，高铠庭在天后宫即为主事道爷的支持帮助下，积极筹备成立“天津无极国术研究社”。

1931年6月24日，“无极国术研究社”成立大会正式召开，高铠庭的老恩师徐师父坐在大院主席台正中央，两旁是师叔、师伯和请来的各门派掌门及天津武林知名人士。简单的开场白过后，便是武术表演。高铠庭魁梧有力的身材，不怒而威的面庞，炯炯有神的眼睛，穿着白纺绸大褂，足登青布实纳帮洒鞋，非常惹眼。他先表演了左把春秋刀，以示立场向关圣人表示尊重。其后，同门师兄弟表演中又穿插了高铠庭表演的形钩，双钩卷浪、风摆荷叶的跌宕起伏与春秋大刀劈、砸、撩、剁的雄伟气势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招一式之中显现了功

力深厚，确有独到真传。最后，老恩师徐师父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表演了九耳大环刀。刀光闪闪风声嗖嗖，尤其是一个穿步上，亮出了轻功的绝活，一个箭步窜出三丈开外。全场当时鸦雀无声，稍后才是掌声雷动。这次表演亮相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会后，全体到会人员在石头门坎聚餐，酒席间人们仍不停地谈论精彩的表演，尤其对无极门及高铠庭的功夫给予充分肯定。由于大会期间也有其他门派的表演，再得益于高铠庭精心准备和妥当安排，“天后宫无极国术研究社”成立大会，演变成一次天津武林盛会，无极武术也借助这次盛会得以大规模公开展示，得到了武术界和社会大范围的认可。

高铠庭不但追求个人事业，更为注重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常对徒弟们讲：“国若不堪，何以家为！”正是基于此，高铠庭不仅努力提高自身的武术修为，认真地传授徒弟无极武功，更是心系国家民族的安危和兴盛。他晚年时常对其子高铁静说：“国家要是完了，你个人再有本事，还不是亡国奴一个，没有用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烽烟四起、民不聊生，高铠庭利用在天后宫教武术的影响和人脉，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1949年天津解放后，高铠庭参加了欢庆天津解放的活动。1950年，天津市成立武术运动委员会，选举了七位常委委员，高铠庭就是其中之一。党和政府的信任大大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除了做好自己武术教师本职工作以外，他还积极投入到社会工作中。

高铠庭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重视理论，在其武术生涯中组织文人学士编写了无极十二形规范动作、子龙大枪、童子功、罗汉功百兵图等图文并茂的文字资料，流传后世。他平时常对弟子们要求“三分练，七分讲”，可见其



对理论的重视。他对于武术理论的重视也使无极功的流传有据可依，为无极武术传承创造了条件。



1937年，高铠庭（右一）在天后宫切磋武艺

## （二）创立天津无极武术研究会

最终，高铠庭将无极武术传给了儿子高铁静。高铁静现任无极门第六代掌门，天津无极武术研究会会长。高铁静和津门徒弟们刻苦练功、共同努力，使无极武术得以发扬光大。他们多次代表天津参加国内外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2007年，天津无极武术研究会成立；2009年，天津无极武术被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天津无极武术研究会已发展有东丽、河西、南开等13个分会，天津无极武术后继有人。2021年5月24日，无极拳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1年“无极拳”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提到无极武术，高铁静介绍说，主要分八个部分：一是按照十二生肖演化而成的十二套象形拳，每套象形拳又分为四式，每式有五种不同的用法。在运用时可以根据对战的形势随意转换。二是无极子龙大枪，这套大枪不同于其他枪术的一个突出地方，是以死把握枪的方式而著称。说到这儿高铁静先生还专门从屋里抓起一杆大枪做了个死把握

枪的姿势，他说这样使用可以出枪快捷，有力变化灵活多端。三是无极乌金刀，这套刀法以独特的操练法区别于其他表演性刀法。四是无极罗汉功法。这是种气功，主要是强身健体的需要。五是无极童子功法，也是用来祛病养身健体之用。六是无极靠板及踢桩法，并有绵沙掌练习法。高铁静说：“练无极功的有一项功法叫作铁砂掌，也就是用手掌不停地往装满铁砂的沙袋里插，最终练出一副‘铁手’。”高铁静一双手的手指骨节都很粗大。他说他父亲及前辈们的手指更明显，那都是练功的结果。那样的一双手劈木木折，劈砖砖裂，打在身上更是骨折筋断。七是无极鹰爪功练习法。八是无极形拳及器械的演练。对于无极形拳，高铁静说：“这套拳法只是用来供观赏及表演参赛之用。在许多大型比赛中，有些是套路比赛，而无极拳恰恰是没有自己的形拳套路。无极武术要求练习无极拳的弟子除苦练扎实的基本功外，还要以十二生肖的象形拳的招式，见招拆招，借力打力，但这些练法不符合比赛和观赏的要求，所以无极武术的前辈们也就因此而编了这套形拳。”

高铁静先生回忆起津门故里许多关于无极门前辈和自己的一些习武轶事。他说：“父亲高铠庭一生从事无极武术事业，传人甚多，他用自身的武艺和影响力，吸引并教授了包括著名教育家、书画家、艺术家、政治家等在内的众多名人弟子。为无极武术发展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谈到自己习武时，高铁静说，自己从小就和一帮师兄弟们随着父亲在家习武，从没有间断。“文革”中家里有170多件各式兵器、无极门的拳谱等都被洗劫一空，就连父亲开在天后宫的“无极国术研究社”也于1966年7月关闭了。他们没处练武便跑到人

民公园里找到几棵大树练摔桩，一次有几个地痞在附近寻滋闹事，见这些练武的孩子们竟然在飞跑起来后，跃起用肩膀撞向大树，将大树都撞得不停地晃动。几个地痞一见不好，马上跑掉了。后来，高铁静因为工作原因从市里迁到东丽区居住，一晃已有三十多年了。

高铁静落户东丽区吴咀村后，除去每天的工作，便是利用闲暇时间练习无极武术。他说：“那时因为没有太多的闲暇时间，所以便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来练功。比如骑自行车时我还在思考无极武术的功法理论，及一些练功招法，如何踢桩、如何打靠板、如何更好地练习形拳等等。另外还有坚持站桩，这些都是练习基本功不可或缺的。”当有记者采访高铁静时，已是年过花甲的他伸出一只脚说道：“你用脚来勾我，看能否勾得动？”记者伸出脚使劲地勾了半天，高铁静依然纹丝没动站在那里。高铁静笑着说：“这个站桩那还是年轻时打下的基础了，现在恐怕有小二十年没练了！”在谈到传徒授艺时他说：自己在1975年28岁时，经父亲允许就开始收徒了。直到现在，各个年龄层次的徒弟都有，有的徒弟的徒弟都已经一大群了。他接着说：“在我的有生之年将我学到的技艺和理解，传给弟子们，这样无极这门功夫就不会在我手上失传了。如今无极拳已经是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这门古老的功夫在我们这一代得到了有效地保护，并得到了发扬光大，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

提起无极武术的前辈们，高铁静更是充满敬仰之情。尤其说到无极武术传到天津的第一代传人王玉珍前辈时，他说：“王玉珍是河东汪道庄人，自幼喜爱武术，十二岁那年，在得遇从河南专门到天津访徒的蔡锦堂先生后，便一直跟随蔡先生学习无极武术。王玉珍先生对无极武术在天津的发展和传承可以说贡献巨

大，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无极武术传人，其中不乏民国大总统曹锟、两广总督岑春轩手下的武术总教官闫雨轲等知名人士。在当时王先生还经常和各派武林高手进行切磋，像大枪李登弟、雪片刀薛凤林、盖三省万国玺，甚至赫赫有名的霍元甲等武林高手。但最脍炙人口的还是和清末亲王府总护院神枪杨的过枪，两人在大战了三天后，王玉珍最后用了一招‘滑枪’将杨战败，遂得王爷褒奖：神枪之上，可称王矣！”由此得“杆子王”美称，享誉京津（大枪练习较技时用大杆子）（注：《沧州武林志》有载）。高铁静说：“实际上高手交战根本就不是电视、电影里演的那样来来往往没个完，冲上去一个错身那就是一个回合。而王玉珍和神枪杨在最后实际上就是一招制胜。”说着高铁静提起一杆枪，两手平握忽然一松手身子往前一蹿，两手再抓枪时人已到了枪头的位置。“就这么一招！”在高先生的演示下真是一目了然。

年过花甲的高铁静晚年主要精力都在传承无极武术的工作中，他的徒弟遍布各行各业。有的徒弟开起了武馆，而高先生有时便到武馆给徒弟帮忙，并且他还在整理一部有关无极武术的拳谱。习武已近50年之久的高先生曾多次在全国的各项赛事中获奖。2004年，他率队代表天津在辽宁参加了全国传统武术大赛，其中两人代表无极武术参赛，一举夺得两枚金牌。之后他致力于无极武术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并于2006年12月正式成立“无极门研究会”。接着在短短的几年间天津无极武术多次参加各种赛事，共取得了111块金牌、74块银牌、59块铜牌，涌现出两名三项全能冠军和一名香港国际散打季军、一名三项全能亚军。2012年，无极武术又在黄山第五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上获得二金一银的好成绩。近年



来，他们在各个分会教授无极武术，传艺授徒，培养出一批六段的队员和优秀教练。作为东丽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高铁静积极宣传“无极拳”这门传统的武术技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无极拳”，参与到无极拳的学习中来。他说：“为了回报东丽父老，他们每年的‘五一’都在东丽广场举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极武术演练大会，为东丽区的全民健身活动增添一份力量。”



高铁静正在练功



高铁静的获奖奖牌

### (三) 创办仁爱无疾（天津）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高铁静之子高振兴，作为无极武术第七代

传承人、仁爱无疾（天津）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倍感责任重大。在其父高铁静（无极武术第六代传承人、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带领下，自幼秉承家传，勤学不辍，而后又利用三年多的时间将《百兵图》中一百零八件兵器逐一复原，使丢失30余年的宝贵资料珠还合浦，在申报国家非遗的过程中成为非同小可的重要资料。

仁爱无疾（天津）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大力推广国家非遗项目的传承活动，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指导核心，积极响应国家推崇“全民健身”的号召，国家对传统武术的愈加重视，高振兴作为无极传人在兴奋之余，倍感肩负责任重大。一直以来，他跟随其父整理无极武术相关的文字影像资料，重新编写《无极武术源流及津门发展》等相关书籍，对无极武术的发扬起到至关重要的宣传作用。目前，正在和无极武术研究会几名骨干全力编纂《无极武术》一书，并全面负责该书的整理、修订工作，同时以无极研究会为依托，以“怀揣仁爱之心，脚踏实地做事，传承非遗文化，发扬优秀传统，祈愿天下无疾”为企业文化，致力推广、研习、传承无极武术的相关活动，结合中医养生学、康复学、心理学等领域，挖掘无极养生功的实际指导意义，在保持身心健康方面贡献作为非遗项目的全部精髓和力量，努力培养无极接班人。

#### 参考资料：

- [1] 2019年东丽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材料。
- [2] 采访高铁静口述。
- [3]《万新街道志》（终审稿），2022年。

（作者单位：东丽区地方志办）

# 宝坻带“口”字村名探源

王宗征

在宝坻现有700多个村庄中，村名带“口”字的达31个，这种有趣的村名现象值得方志工作者关注。而对其村名来历进行探源，对于了解宝坻境内乡村历史地理是有一定帮助的。本文拟就带“口”字宝坻村名进行探究，以供方家和同仁参考。

## 一、宝坻村名带“口”字村庄概览

大定十二年（1172），金世宗在新仓镇基础上，钦定设置宝坻县。历史上的宝坻县，行政区划多有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宝坻县先是隶属河北省，1973年8月划归天津市管辖，2001年撤县设区，成为天津市新区之一。在历史沿革和演进过程中，宝坻的村庄建制也相应变化。从古到今，宝坻境内村名中带“口”字的村庄较多，这一村名现象成为宝坻地域文化的一个特色。

根据宝坻区现有村庄统计，村名带“口”字的村庄有大口巷、大道口、小道口、前高家口、中高家口、后高家口、陈家口、大口屯、东绣针口、西绣针口、新开口、王家口、前六家口、后六家口、东老鸦口、西老鸦口、郿羊口、口东、黑狼口、西河口、林亭口、曹家口、于家口、孙家口、李家口、艾家口、三岔口、牛道口、杨家口、小河口、小口哨，共计31

个，可见“口”字出现在宝坻村名中的频次是村名用字最高的，由此可知当地村民对“口”字的偏爱。这些村名带“口”字的村庄，分属于宝坻区24个镇（街）。从其表象看，村名最后一个字为“口”的，数量最多，达27个；其次是“口”字在村名中间，有3个；而村名第一个字是“口”字的，只有一个。这些村名中“口”字的含义，或是河口，或是渡口，或是道口，或是巷口，或是沟（渠）口，或是与河道决口相关。而探究宝坻带“口”字村名及其村庄的由来，追寻其细节之处，则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地理内涵和传统文化意蕴。

## 二、宝坻带“口”字村名追根溯源

探源地名由来是地方志（地名）工作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而村名作为地方志范畴的基础性地域概念，对其追根溯源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地名中带有共性的现象，从其地名由来进行深入探究，挖掘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增强对地名的理解和认识，是充实地方志资料的一个重要手段。多年来，宝坻地方志（地名）工作者对宝坻地名尤其是村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证和探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这些成果中，重点解析该区村名带“口”字的文化现象，弄清楚相关村名的来龙去脉，不仅有史料价值，



而且别有一番意趣。

### (一) 与萧太后运粮河关系密切的村名

萧太后运粮河是宝坻历史上一条具有较深文化内涵的经人工开挖的漕运河道。据吴静顺主编《宝坻县志》<sup>[1]</sup>的“水路”一节记述：“公元10世纪左右，辽统治者为从海口（今天津市东郊区军粮城一带）运粮北上所开之运粮河（一称‘萧河’），自海口北上入今宝坻境（时属香河县），大体沿今之大山庄、林亭口、王补庄、新开口、大口屯一线行进。通过该河，可将军用粮运至大口屯储存备用。”作为历史上我国北方一条作用和名气都较大的漕运河道，萧太后运粮河不仅在辽代占有重要的水运地位，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比较长远的。清乾隆十年（1745）宝坻知县洪肇琳主持编修《宝坻县志》，在其卷之十四“拾遗”条目中记载萧太后运粮河：“粮河，在县南五里，古海运河道也。元世祖以越海不便，塞之，今河形尚存。”正是萧太后运粮河的历史影响较大，与这条穿经宝坻的运粮河相关联的村庄，在取名字的时候，便考虑这一历史地理因素，村名带“口”字的村庄与这条运粮河的关联度尤为紧密。如新开口村（今属宝坻区新开口镇），在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形成村庄时，因其村北有辽代萧太后运粮河残存河段，村民出入过河很不方便，需要绕道王家渡口才能过河，遂在临村河道新开一渡口，故得名新开口。而距离此村不远的王家口村（今属宝坻区新开口镇），元朝末年成村时，由于坐落于被称为萧太后运粮河的河道渡口处，遂以渡口得名王家渡口，后简称王家口。

早在唐朝就已建村的西河口村（今属宝坻

区口东镇），最初叫双庙，到了辽代，因萧太后运粮河从其村头穿过，处于河口处的双庙村便改称西河头，后习惯上称西河口，村名沿用至今。小河口村（今属宝坻区大口屯镇），昔日村庄南侧的古河道也是萧太后运粮河（萧河），相传周姓居此建村，取名萧河口，后谐音“小河口”，这个村名也沿用至今。小口哨村（今属大口屯镇）村名的得来，与萧太后运粮河同样有密切关系。该村原名凤凰村，因其处于萧太后运粮河（萧河）河口下稍，得名“小口下稍”，因“稍”与“哨”谐音，故简称“小口哨”。与小口哨村村名中的“口”字同在村名中间的大口屯（今属宝坻区大口屯镇），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其居民多由当时陕西、山东、河南一带迁入，在此定居后成为村（镇），由于此地是萧太后运粮河河口，朝廷在此地囤积食盐，储存粮食，以备水路运出，故得名大口屯。如今，大口屯是一个“片村”的统称，由镇东、镇西、镇北和六合4个村组合而成。

实际上，古代宝坻境内所谓“萧太后运粮河”并非一条，而是有多条，其中被称为绣针河的古河道，也曾经被称为萧太后运粮河。东绣针口村（今属宝坻区大口屯镇），相传在辽代建庄，村庄与绣针河相接，官府在此设口检查来往船只和行人，该村居绣针河之东，故称东绣针口，而西绣针口村处于绣针河之西，故得名。

### (二) 因薊运河而形成的村名

位于宝坻东北部，坐落于薊运河畔今属宝坻区新安镇的于家口、曹家口、孙家口、李家口4个村庄名字的由来，都与薊运河有关。薊

[1] 吴静顺主编：《宝坻县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运河是一条古老的河道，古称潮河，属于单独入海的一条河流，在我国古代漕运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唐朝时，蓟运河体系已经全部形成。作为自然冲刷和人工整治的古老河道，蓟运河穿经宝坻西北至东南部大片区域，河道较长，流域较广，对宝坻历史地理产生的影响深远。单从村名带“口”字的村庄来说，相对距离较近的于家口、曹家口、孙家口、李家口等村庄，都处于蓟运河沿岸，村名的来历与蓟运河密不可分。先说于家口村，它位于蓟运河西岸，明朝永乐年间建庄，随燕王朱棣扫北有于姓落户于此，建此村庄，最初叫“于家口头”，后改称于家口。再说曹家口村，坐落于蓟运河右拐弯处，村庄北、东两面靠近河堤。明朝初年，有曹氏兄弟在蓟运河东侧和西南侧分别建村，哥哥建大曹庄，弟弟建小曹庄。民国 26 年（1937），统称为曹家口头。民国 34 年（1945），简称为曹家口。孙家口也处于蓟运河怀抱，明朝永乐年间有孙姓随燕王扫北落此定居，取名孙家口头。民国 35 年（1946），改称孙家口。李家口村，东、西两面处于蓟运河怀抱，北与孙家口村有一墙之隔，明朝永乐年间建村者为李姓，故取村名李家口头。后改称李家口。可见，这四个村名带“口”字的村庄都依蓟运河而建，村名均与蓟运河及其河口有关。

### （三）与其他古河道相关的村名

宝坻地处九河下梢，古往今来河道众多，成为一大地域特色。宝坻境内带“口”字村名的由来，除了与萧太后运粮河、蓟运河有关外，还与鲍丘河、窝头河、泃河、州河等古河道相关联。如杨家口村（今属宝坻区方家庄镇），鲍

丘河自北向南从村中流过。明朝永乐年间，随燕王扫北的苗、王表兄弟从山东来此定居，村庄靠近鲍丘河决口处，村民以养羊谋生，遂以“羊”字谐音取村名杨家口。而牛道口村（今属宝坻区牛道口镇），西、南处于鲍丘河怀抱，明朝燕王扫北后，该村有刘、王两家定居于此，后又增冯姓，尚无村名，但他们居住的西侧正是鲍丘河道，河道上有一架草木桥，相传每当早晨太阳还未升起时，观此河道口，隐约出现一头牛卧着，太阳升高这头牛就不见了，村民受此启发，为村庄取名牛道口。宝坻带“口”字村名中唯一“口”字为第一个字的口东村（今属宝坻区口东镇），村名的由来与窝头河有关。该村宋朝末年成村，先以村内首户姓氏命名崔家庄，后杨姓迁入，改称崔杨庄。明朝末年，流经村西的窝头河决口后，人们习惯上以“口子东边”称之，后演化为“口东”，成为村名。而地处宝坻、蓟州交界处的三岔口村（今属宝坻区朝霞街道），村名由来更是与古河道相关。该村建村于辽宋时期，当时村庄北面的泃河与流经这里的州河汇流后入蓟运河，同时又在泃河南侧有新开挖的运粮河通往今之天津。由于三岔口村坐落于泃河、州河、运粮河的三岔口汇流处，故取名，一直沿用下来。

### （四）与古代陆路交通要道有直接关系的村名

大道口村和小道口村（今均属宝坻区海滨街道），村名由来都与清代一条穿经宝坻的重要陆路要道分不开。据孟宪昆主编《天津市地名志·宝坻县》<sup>[1]</sup>诠释，据传清朝前期，大道口村前有一条从山海关（古长城东部起点）到都城北京的大道，从此道经过者操着不同方言，属

[1] 孟宪昆主编：《天津市地名志·宝坻县》，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0 月出版。



外地口音，村民戏称这条大道为“侉子道”，而村庄正处在这条大道的道口，便取名大道口。至于小道口村，处于当时这条大道的道口旁，村庄规模也比较小，故称小道口。

### （五）个性化鲜明有趣的村名

宝坻境内村名带“口”字村庄名称的来源，除了与境内古河道和陆路要道相关外，一些村庄名字的由来，有着个性化色彩很强的因素。比如，大口巷村（今属宝坻区海滨街道），与宝坻县城临近，处于县城东侧望门大户芮家的坟地南端。相传，芮家坟地是明朝宰相刘伯温给看的，是一块“龙地”，意思是将来芮家要出皇帝。清朝时，有个宝坻知县也看出了芮家坟地有风水，就想和芮家结亲（当时芮家在朝廷中的权势很大），被芮家拒绝。县官感觉芮家瞧不起他，很没面子，一怒之下，想出一个报复芮家的办法，将县城东门往南迁建，城墙留出一个大豁口，成了一个大巷路口，意在用这个大豁口和大巷路口冲煞芮家坟地的风水。由于大口巷村正对着这个大巷路口，故名大口巷。黑狼口村（今属宝坻区口东镇）名字的由来，也有传奇色彩。该村始建于明朝，因始成村街道似龙身，胡同形如龙爪，街西口又斜对着黑龙沟口，故得名黑龙口。后因附近建刘台村，并在街心建一座小庙，名为龙虎庙。黑龙口村认为此庙对本村不利，即于明末清初将村名改称为黑狼口。

而东老鸦口村（今属宝坻区大白庄镇）和西老鸦口村（今属宝坻区牛家牌镇），处于萧太后运粮河沿岸，得河水之利，加上村庄地势低洼，水塘较多，盛产鱼虾，招来大批鸟儿尤其是乌鸦栖息，古人对乌鸦有“百鸟护相”的传说和赞美，乌鸦被人们视为吉祥鸟，于是有了

“老鸦口”的说法，意指“乌鸦栖息的海口”。因两个村庄各居东、西，便有了东老鸦口和西老鸦口的村名，可见这两个村名与鸟儿关系紧密。

前六家口村和后六家口村（今属宝坻区新开口镇）的村名由来，也是有内在联系的。相传，后六家口在明朝建村，始有六户蒙氏人家居此，最初取名六家口，后有一部分人从此村迁出，另立新村，为区别之，遂改称后六家口。前六家口从由六家口（即后六家口村）分出，并在后六家口村南侧建立新村，因其位置靠前，便取名前六家口。

艾家口村（今属宝坻区新安镇）村名的来历，说起来有些小资情趣。这个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村庄，因建于艾家坟地的南口，故名。而乾隆十年《宝坻县志》中被称为“巨镇”的林亭口（今属宝坻区林亭口镇），其村名源于一座小亭子。此村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因其靠河临水，村民以捕鱼为生，人口逐渐增多，村庄绿化和美化得到重视，人们在村庄附近栽植松林，并于松林中修建一座小巧的亭子，行人常在这座亭子乘凉、休憩，便把这个松林中的亭子取名“林亭”，加上这个村子处于河口地带，因此有了“林亭口”这个村名。

综上所述，宝坻带“口”字村名的由来，是其历史地理特色因素的具体体现，既有相对共性的成因，也有个性较为鲜明的渊源，有规律可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些村名及其来历，或见之于文献记载，或是接续不断的口耳相传，但都成为有趣的乡愁记忆，也是当地方志文化的符号，对此进行深入挖掘和探源，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其意义不可低估。

（作者单位：宝坻区档案馆）

# 关廷牧始修《宁河县志》

孟昭林

宁河位于天津市东北部，地处京津唐大城市群中间地带。自清雍正九年（1731）分宝坻地始立宁河县，“与宝坻并为京东望县”，<sup>[1]</sup>“密迩邦畿，神京左卫”。<sup>[2]</sup>

对地方行政官吏来说，志书是施政必备之书，正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所以古代地方官吏很重视修志。关廷牧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始修《宁河县志》。

关廷牧，字丛桂，号西园，广东海南县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三甲第一百一名进士，榜名陈廷牧，乾隆四十三年（1778）改复原姓。乾隆三十九年（1774）来宁河任县令，是宁河县第28任知县。

俗话说“盛世修志，明时撰史”，那么，创修《宁河县志》的职责何以落在关廷牧的肩上呢？

第一，填补空缺，划清疆域。清王朝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纂，明文规定地方官上任要奉行三十二项“初规”，其中第三项就是“览志书”，可见编修和阅览地方志被视为吏治中的大要。况“世宗宪皇帝（雍正）敕修《畿辅通志》，北方无不志之县矣”。<sup>[3]</sup>而宁河自雍正九年（1731）立县，至关廷牧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宁河任知县，已经过了43年，还没

修过一次县志。正如他在《宁河县志》自序中所言：“宁河，东辅邑，为天子甸服。雍正九年分自宝坻，以宝坻之志为志。然邑既分，则志不得复合。今宝坻已别为志，而宁河阙如也，因循散佚，渐且文残献缺，守土之谓何？是岂朝廷建邑之意哉？且自分建以来，阅今几五十年，愈久将愈湮，则志之作不容少缓。”<sup>[4]</sup>“梁城为大藩，芦台为雄镇，丁明季而离居荡析。追怀古昔，感慨系之。今其地皆隶于宁，按之宝志，犹未得其详焉。则志之作，又恶容缓哉？”<sup>[5]</sup>为补阙如，是创修县志的主要原因。

关廷牧在《宁河县志》的《凡例》中强调：“始分之邑，疆域尤重。土田之界限，命盗之捕缉，夫役之签发，渠埝之修废，稍有不清，每多牵混推卸，至起事端。今按全图，详注四址，细列八到，庶几经界截然。”<sup>[6]</sup>其在《宁河县志·职方志》中更进一步说明：“古者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所以严疆域之限也。然古今屡变迁矣，数百年而一易，或数十年而一易，其地固在也。问其东西南北之所至，虽博雅之士，或不能详焉。代远年湮，书缺有间，考古者所为抚卷怅然也。守地偏小，自宝坻分置以来，其疆域正有毋容混者。不为著明

[1] 《宁河县志译注》，第993页。

[2] 《宁河县志译注》，第1页。

[3] 《宁河县志译注》，第8页。

[4][5] 《宁河县志译注》，第11—12页。

[6] 《宁河县志译注》，第28—29页。



之，后之人孰从而求之？今分表其四界，确核其里数，详著于篇，庶不失古人制地正封之旨云尔。”<sup>[1]</sup>正疆域是一件大事，宁河是刚分出的县，如果疆域不清，那么土地的界限、捉拿盗贼（古有越界不办案之说）、遣派差役，河埝的兴废，稍有不慎，往往因混淆而推诿，甚至引发争讼。

第二，盛世修志歌功颂德。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关廷牧借修志为朝廷歌功颂德。他在《宁河县志》自序中写道：“我国家承平百三十余年矣。河渠水利，经列圣之所经营，以成乐土，又幸近附畿甸，涵濡沐浴，被化犹亲，食旧德服先畴。乐其乐而利其利者，雍然三代之休风也。牧幸得以公务余闲，进邑之文献，搜罗而咨访焉。退而与徐君舍亭辈，博稽而详订之，则是志之成，虽一隅之纪载乎而实圣世太平风俗之书也。”<sup>[2]</sup>在卷十一《艺文志·宸翰》的“谨按”中写道：“言以圣为归，文以经为则，典谟雅颂，古圣之言也。而后世诏谕，悉由此出焉。文之时义大矣哉！我国家右文稽古，列圣相承，纶綯所颂，沦肌浃髓。皇上乘至圣之德，游心文苑，晖丽日月，弹压山川，况属首善之区，瞻依尤切，兹敬录有关宁邑者，以见典谟雅颂之则焉。”<sup>[3]</sup>表达了对皇上的无限赞誉与尊崇之情。

第三，有强烈的责任感。宁河自立县至此几五十年，关廷牧之前已经历了 27 任县令，而关廷牧能担起创修县志的责任，是其具有强烈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在《采访告示》中写道：“顺天府东路厅宁河县正堂关，为纂辑志书，广行采访事：照得国史大搜罗，统天下以昭实录。邑乘详记注，稽境内以勒成书。唯分诸邑者，博而精；斯合诸国者，简而括，是宜悉心撰述，备厥参稽，安可不加意网罗，听其放失。乃查吾宁，建邑以后，四十八年之事，尚缺编摩。即本县莅任以来，二百余庄之风，未遑采辑。将典章罔据，前乎此者奚所传，载藉无征，后乎此者何所考？遂使声明文物之地，弇鄙增羞，足今博闻强记之儒，英华减色。此诚宰斯土者所当任其责，而亦生斯地者所难卸其肩。”<sup>[4]</sup>时不待我，把修志作为当任之责。

第四，任职时间长，有良史之才。关廷牧是在宁河县任职时间最长的县令，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来宁河署任，乾隆五十年（1785）五月升任卸事，在宁河近 11 年，而他的前任者，在宁河任职时间都较短，有的几个月，最长的三四年。这让他有充足的时间熟悉宁河、搜集宁河的史料。

另外，关廷牧有良史之才，顺天府东路同知沈承业在《宁河邑志序》中说：“南海关君，以名进士来宰是邑，学道爱人，政平而讼理，宁之民咸德之。”<sup>[5]</sup>该志总纂、曾任江南仪征知县的徐以观在《跋》中说他：“以良吏之治，秉良史之才。”<sup>[6]</sup>丁符九在《重修宁河县志序》中也说：“乾隆己亥，南海关令以名进士来宰是邑，本良史之才。”<sup>[7]</sup>从他存于《宁河县志》

[1] 《宁河县志译注》，第 81 页。

[2] 《宁河县志译注》，第 11—12 页。

[3] 乾隆版《宁河县志》卷十一，第 16 页。

[4] 《宁河县志译注》，第 25 页。

[5] 《宁河县志译注》，第 5 页。

[6] 《宁河县志译注》，第 993 页。

[7] 《宁河县志译注》，第 1 页。

的十余首诗词中，也可一窥其深厚的文史底蕴。

为纂辑志书，先筹资设局，后下发改示，招聘人员，除关廷牧任“总理”外，还聘用60多人参与，其中宁河籍的进士就有8人之多。“始戊戌之夏，不阅岁而竣”，<sup>[1]</sup>《宁河县志》修成，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顺序编成6册。

### 1. 《宁河县志》资料来源

该志《采访告示》中说：“本县技等雕虫，识慚亥豕，而且三年作吏，深知学殖之久荒，即或一得可陈，终恐才华之未富。苟非众长之兼集，何以大备而无遗。爰布虚公，亟行采访。为此示谕绅士耆老人等知悉，示到，各宜踊跃，共效赞襄，大肆搜求，务广众思之益，竞抒闻见，稍分独任之劳。”<sup>[2]</sup>总纂徐以观在《跋》中也说道：“博采旧闻，搜讨阙轶，远咨知名之士，近询故老之传。”<sup>[3]</sup>可知，大部分资料来源于搜求采访，在该志中录入姓名的采访人就有14人。

另一部分来源于典籍。该志《凡例》中说：“作志必稽掌故，而掌故必资典籍。宁邑濒海，家鲜藏书，除《畿辅通志》《日下旧闻》外，无从借证，势不得不取材旧志。而宝志惟洪志征引稍博，然往往有泛涉之失，今采其有关体要者录之。”这里的“宝志”“洪志”，是指宝坻县令洪肇琳所修《宝坻县志》。洪肇琳乃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进士，乾隆四年（1739）任宝坻县令，乾隆五年（1740）署宁河县令，乾隆六年（1741）又调宝坻任县令，乾隆十年（1745）升任磁州知州。乾隆十年洪肇琳主持编修了《宝坻县志》，诸版《宝坻县志》中，唯洪志内容最为翔实。故而关版《宁河县志》中收录了宁河分置之前《宝坻县志》中的部分内容。

[1][4] 《宁河县志译注》，第5页。

[2] 《宁河县志译注》，第25页。

[3] 《宁河县志译注》，第993页。

如人物志中有9人的资料取自《宝坻县志》，艺文志部分从中取材最多，《宸翰》目中有15篇、《奏疏》中有1篇、《墓志》中有2篇、《记载》中诗词16首，《风物》中有1篇，丰富了宁河分置前的部分史料。

### 2. 《宁河县志》主要特点

(1) 内容全面，体例详备。关版《宁河县志》采用纲目体（门目体），分门十、标目六十有五，汇一十有六卷。一告示、凡例、图形等，二职方，三建置，四祀典，五赋役，六职官，七选举，八九十人物，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艺文，十五风物，十六杂识。卷前有诰授奉直大夫、顺天府东路同知沈承业的《宁河邑志序》，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隶兼理河道、管巡抚事杨景素的《宁河县志序》，关廷牧的“自序”和该志总纂、原任江南仪征县知县徐以观的《跋》。

沈承业在《宁河邑志序》中评价该志：“其议论一衷于经，其体裁一准于史，其记述国政者，称先则古，一媲于唐虞三代之隆，何其体而有要也。此古之循吏所谓能以经术润色吏治者也。观于职方，知版图之胜；观于建置，而知规为之善；观于赋役、河渠、职官，而知政治之美；观于选举、人物、风物、艺文、杂志，而贤才众多，庶类蕃阜；散见于歌咏传述以昭升平而道盛美者，无不详而悉。呜乎，何其备也。‘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辞胜’，可谓兼之矣。”<sup>[4]</sup>徐以观在《跋》中也称道：“志乘之书，纂修与创造其难易迥殊。纂修不过损益前文，补缀近事；创造则一言一事之记载皆后日所取则焉，苟非择精语详，囊括众善，未



易云美备也。今先生以良吏之治，秉良史之才，体例既极精严，叙述更为雅洁，序论之美，酷似司马欧阳，真可远迹金华，近跻灵寿，为斯邑志乘权舆，以导河海之源者矣。”<sup>[1]</sup>该志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如《艺文志》中收录的元平州路廉访使赵铸的《重修芦台兴宝圣母庙记》、元翰林院直学士高鸣的《兴宝圣母庙记》、明直州分司同知陈九功的《复修兴宝神祠记》，记载了芦台场盐业发展的历史和传说，这是研究宁河及天津地区盐业发展史和盐文化的重要资料。又如志中所录县令沈浚所撰《勅建学宫碑记》、县令关廷牧所撰《渠梁书院记》等，是研究宁河文教事业发展的基础性资料，而《银鱼说》《银鱼冰鲜二首》《冰鲜行》等诗文，不仅说明宁河三宝——银鱼、紫蟹、芦苇草中的银鱼、紫蟹是冬季捕捞的冰鲜，而不是其他季节的面条鱼与河蟹，揭示了其作为贡品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至于体例详备，关廷牧在《凡例》中解释道：“宁志事属创始，则将来之损益系焉，其体例自宜详备。今立纲十门，标目六十五，则以备记载之权舆，庶后之考证者有所取裁。”<sup>[2]</sup>不能列入志书常规门类的内容，则另辟杂识一门。他在此卷首写道：“洪志矫杜志之简，于此多标门类，有曰拾遗，又曰别录，又曰集说，内又分建小目，侧生旁挺，斯以勤矣，然多此纷纷，不免屋下架屋之弊。余以杂识统之，曰古迹、曰庙观、曰饁祥，而以纪闻终焉。然诸志家，多终于艺文，兹以杂识殿后，何也？易曰‘物相杂，故曰文’，是杂识亦文类也，从其

类也。”<sup>[3]</sup>《杂识志》语言简练，史料珍贵。如“梁城，五代刘仁恭镇时所筑”“军粮城，在县西南一百四十里，刘仁恭所筑”“小盐河，即汉沽也”“(明)宏至二年，大水，饥；六年，鬼兵动，潞河以东村落居民，奔骇渡河，多溺死者”“水圣，海神也，相传姓滕，讳经，本一文士，年二十三，落河成神，故称为小圣”“西塘坨民刘守秀之妻赵氏，年三十八，于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一产三男，俱存育无恙。直隶总督方，咨部，照例赏以米五石，布十匹，折给银两。以资养赡”等。

百余年后，丁符九重修《宁河县志》时，深得体例详备之便。他在《重修宁河县志凡例》中写道：“宁志创自关令，笔法谨严，体例详备，兹纲目一仍其旧。”<sup>[4]</sup>为重修县志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2) 图文并茂，内涵丰富。该志卷一绘制了河图、县图、县治图、学宫图和宁河八景图。河图也可称宁河疆域图，图中标明了县域的四界、河流、水淀和主要村庄。从图上可知，当时曲里海、七里海、后海三海相通，是研究宁河巨泽七里海变迁的重要资料。现在的塘沽原属于宁河县，名为塘儿沽，现属唐山市丰润区的青坨庄，当时也属于宁河县，这就不难理解当时轰动一时的青坨庄丁开嶂“毁庙兴学”的官司为什么由宁河县衙办理了。县图是当时县衙所在地宁河镇的布局图，其街道、主要建筑布局描绘清晰，体现出宁河镇四面环水的特点。学宫图则将《勅建学宫碑记》的内容，用图形直观地表现出来，鲜明地显示出古代学宫“左

[1] 《宁河县志译注》，第 993 页。

[2] 《宁河县志译注》，第 28—29 页。

[3] 《宁河县志译注》，第 967 页。

[4] 《宁河县志译注》，第 32 页。

庙右学”的格局。该志确定了宁河八景，其“按”云：“宝坻志列有八景，其在宁者：夏雾银鲜、芦台玉砂。杜文端公以银鲜水族之微，不足言景，去之，易以海天东胜。前令徐公增其数亦列为八，所列有蓟峰遥翠、粮艘风帆。盖蓟山在宝坻为接壤，宁则去之益远，且粮运已停，景又废一。为更其二，一曰文阁回澜，一曰宁沽樵影。”<sup>[1]</sup>宁河八景即定为：海天东胜、文阁回澜、芦台玉砂、潮河银练、宁沽樵影、江口渔歌、七里烟波、北塘双垒。卷一中每景一图，每图后附一首关廷牧手书配诗，画面简约，书体流畅，图文相映，形象展现出八处胜景的远势雄风，幽光野趣。

(3) 突出教化功能。清代统治者特别重视方志的教育功能。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二十八日，皇帝发出谕旨：“一统志总裁官大学士蒋廷锡等奏言：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书既多缺略，即有采录，又不无冒滥，必得详查确核，采其行义事迹卓然可传者，方足以励俗维风，信今传后。请谕各该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详细查核，无缺无滥，于一年内保送到馆，以便细加核实，详慎增载。得旨：朕惟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绩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着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摭采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sup>[2]</sup>该志明显受这一要求的影响，人物项的篇幅大大超过山川风物，占据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记录

人物 500 多名，其中有事迹者 219 人，包括名宦、乡贤、仕绩、文学、卓行、耆老、流寓、贞节。目的是表彰先贤，感化后进，敦教节义，启发后人，为百姓树立忠孝节义的榜样。

清代方志名家章学诚在《修志十议·议传例》中指出，虽说生人不立传，但有两种情况例外，其一是“惟妇人守节，已邀旌典，或虽未旌奖而年例已符操节粹白者，统得破格录入”。关廷牧在该志《凡例》中也说：“妇道以节孝为首重。节孝即著，则急登之，不忍遗亦不敢滥。恐穷檐嫠妇，冰蘖终身，久而就湮也。即现存者，亦备书之，无俟盖棺之论定。”<sup>[3]</sup>所以，该志仅记节妇就达 132 人，自然是为了“励俗雅风、信今传后”。今天，我们掸去其褒扬节妇的封建伦理灰尘，似乎可以窥见些许求实致用的精神和对弱势女性的怜悯之情。

(4) 论赞探微阐幽，画龙点睛。现代志书要求“述而不作，叙而不论”，而古代志书是可以有评论的，名为“论赞”。论赞是中国历代书籍和文章中的一种定型化的文字体式，一般认为起源于《左传》。《左传》称“君子曰”，《史记》称“太史公曰”，后又称“赞曰”“论曰”等。志、记、传也可以有论赞，其功能都是对人、事的评论，是著者发表的关于史事的思想、主张、见解。

关廷牧在该志中写了 51 篇论赞，附于每目记述之尾，以“论曰”的形式出现，或对仁人君子之义行壮举抒发敬仰之情，或对重大事件提要勾玄以探其成败之因，或揭露社会丑行以鞭挞不正之风，或引经据典以揭示事物的真谛。

[1] 《宁河县志译注》，第 89 页。

[2]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七五。

[3] 《宁河县志译注》，第 28—29 页。



如《市集》的论曰：“聚人曰财，次政曰贷。古者日中为市，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周礼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经市。凡令无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而司暴司稽，各为禁察，古人能以众整如此。北方市集，犹有古风，以所有易所无。市有常期，物有定值，而工心计，擅奇赢者，无从垄断于其间。故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sup>[1]</sup>记述了集市的由来与作用，强调集市要加强管理，对弹压市场、强横凶暴者要严为查究，给以惩处，让那些垄断居奇、投机取巧者无计可施。并且说明观察集市的情形，也是判断社会治理如何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此引起当政者的重视。《县令》中的论述为，“论曰：邑令为亲民之官，于一邑事无所不统，其任巨矣。令之贤否，间阖之安危系之。居斯位者，可苟焉而已乎？鸣琴而治尚已，兴学校，课农桑，要亦尽人可勉者，而竟谢之，贤否果何属也？”<sup>[2]</sup>指出县令应为爱民之官，县令贤否关乎全县人民的安危，责任重大。纵然有不下堂就可无为而自化的固然清高，然兴办学校，督促农桑等重大事务本应亲力亲为，实实在在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那些自矜清雅的官员，算不算好官呢？鸣琴而治者又有几人？这是对为官者的灵魂拷问。《名宦》一目的论赞为：“循吏难矣！考《史记》孙叔敖而下五人，《汉书》黄霸而下六人，而唐而宋，其间或十数人，或数十人，苟非实有功德于民者，无由滥入。求其所居而化，所去而思，盖其难哉！后世人冒荣名，其所记载类多溢辞，

不足考信，识者病焉。然乡间父老，树底辍耕，墙根曝背，于有司政治之美，每乐为子若孙津道之，知三代之直道常存也。兹悉屏私评，博采舆论，得若而人焉。其未分县前，则间存宝坻之旧，示不忘本也。莅斯土者，当亦闻风而起矣。”<sup>[3]</sup>强调想当一个在职时施惠政于民，去职后为民所追念的官员是很难的。记载于书籍中的官员，有些只是虚冒荣誉，所记很多是溢美之词，不足信。评判官员的好坏，不要看书中的记载如何，而是要走到民间，听乡村父老在树下休息乘凉、墙根晒背取暖之时，津津有味地对子孙所讲的官员善政的故事。正所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百姓满意不满意，认可不可知，才是评判官员好坏的标准。古之官吏能有如此之见解，令人钦佩。《乡贤》的论赞则提出“为善于国，必自为善于乡”的观点，看人贤不贤，要“观于乡，而其人之真见矣。夫少相习，长相优者，莫如乡人。其起居嗜好，衣服饮食，以及一颦一笑之微，无不熟窥而窃志之。乡而以为贤，斯莫不贤矣！”<sup>[4]</sup>虽不能说他具有群众观点，但这一评判观是值得赞许的。不一而足。

关廷牧的评论都是水到渠成之有感而发，而不是画蛇添足、令人生厌的抽象说教和叠床架屋，为人造情的无病呻吟。每篇议论都立足于记述基础之上，因而高屋建瓴、精辟独到，使之切实彰显并起到画龙点睛、明眸善睐与披沙拣金、全篇生辉的收效。

(作者单位：宁河区档案馆)

[1] 《宁河县志译注》，第 87 页。

[2] 《宁河县志译注》，第 186 页。

[3] 《宁河县志译注》，第 357 页。

[4] 《宁河县志译注》，第 368 页。

## 市委办公厅积极推进厅志编修工作

市委办公厅深入落实全市地方志工作推动会精神，认真传达学习领会市领导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批示精神，深入落实《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积极推进市委办公厅志书编修。对前期开展的制定志书编修方案、专家论证、形成编修大纲等工作进行总结，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修改完善志书框架大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实际，进一步统一思想、厘清思路、明确方向，研究部署了下一步重点工作。

一是发挥牵头部门抓总作用。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加大督促和沟通力度，推动各局处室按时保质落实任务分工，确保编修工作进度和质量。

二是加强业务指导。适时邀请市地方志办有关领导（专家）开展业务培训，突出讲解资料搜

集、志稿撰写等环节的工作方法和要领，着力提高编修人员工作能力。通过务虚会、碰头会等形式，及时研究解决编修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是整合资源优势。积极联系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和有关新闻媒体机构等，广泛查询相关档案和新闻报道材料，摸清底数，全面收集反映市委办公厅工作的档案资料信息，为保证志书内容完整系统提供支撑。

四是集合修志力量。充分发挥编修委员会定位把向、专家论证把关的作用。承担编修任务的各局处室扎实做好前期工作，完整系统收集相关资料，为编纂资料长编、撰写初稿打好基础。外聘专职编辑人员提前介入，尽快投入到志书编修工作中。集合力量，众手修志，高标准推进志书编修工作。

（市委办公厅）

##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召开志书编修工作推动会

10月26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召开志书编修工作推动会，听取志书编修情况汇报，分析研究有关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长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局志书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全体人员参加。

志书编修委员会办公室作了总体情况介绍。局机关各处室、局属企事业单位分别汇报了编修工作进展情况，并就前期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如“单位一把手主抓”“请老同志口述史料”“搜集资料全面系统，宁多勿漏”等做了交流互鉴。同时，也提出了“工作人员不固定”“资料收集困难、分类把握不准”等问题。会议充分肯定了前期工作开展情况，针对反映的问题，研究提出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做足做实资料搜集工作、加强指导培训等解决办法，并制定具体措施。

张长林就进一步做好志书编修工作提出要

求。一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法》，切实强化志书编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编修机关事务志作为当前重要工作抓紧抓实，确保工作进度和质量。二要强化责任担当。各单位各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设立AB岗，建立备岗机制，保证人员相对固定、工作推进不断线。三要完善编修计划。结合全局和本部门志书编修工作进度，调整完善编修计划，加快资料搜集进度，为编纂初稿奠定基础。四要加强培训、指导和监督。积极开展业务培训，学习相关标准规范，交流借鉴好的经验做法，制定印发工作明白纸，联系专业修志团队进行指导，不断提升编修队伍能力和水平。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 《合作交流志》编修工作正式启动

11月18日，《合作交流志》编修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合作交流办主任张庆恩，市档案馆党委委员、副馆长吴爱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合作交流办副主任王东主持会议并作工作部署。

张庆恩在讲话中指出，著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工作大局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完整记述天津合作交流工作发展历程，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展现天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发展全景的重要内容。要本着实事求是、为现实服务、认真负责的原则，力求突出时代特征和本市特色，做到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的完美统一，编撰出高标准、高质量的精品佳作。

志，为推进合作交流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吴爱民在讲话中指出，天津合作交流史是天津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纂《合作交流志》对于客观全面反映天津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天津在东西部协作和支援合作、招商引资、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成就具有重大的意义。

《合作交流志》是大型综合志书《天津市志》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天津合作交流事业是《天津市志》重点记述的内容，编纂出版《合作交流志》对于完整保存天津合作交流事业历史，以史为鉴，更富成效地开展好新时代合作交流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该志全部编修工作计划于2025年完成。

(市合作交流办)

## 市档案馆组织召开2022卷《天津年鉴》定稿会

12月1日下午，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组织召开2022卷《天津年鉴》定稿会，专题研究修改2022卷《天津年鉴》样书。市档案馆党委委员、副馆长、《天津年鉴》副总编辑吴爱民出席并主持会议。市地方志馆、方志指导部、年鉴指导部、编研部有关同志参加会议。

会前，《天津年鉴》编辑部已向有关馆领导、处室报送了2022卷《天津年鉴》样书，征求对样书的意见建议。会上，市地方志馆年鉴编辑部负责同志汇报了2022卷《天津年鉴》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存在问题及改进方向，并对馆领导及相关处室给予年鉴编辑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真诚感谢。与会人员结合自身审稿情况各抒己见，从体例规范、文字表述、图片选取、审稿机制等不同角度对年鉴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工作建议。

吴爱民对2022卷《天津年鉴》编辑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要求结合实际认真落实修改

意见，并对今后年鉴编辑出版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提前谋划明年工作。今年发现的不足之处，要在2023卷年鉴编辑的框架设计、撰稿、审校等过程中加以改进，进一步优化框架结构，提升年鉴质量。二是规范供稿要求。在征稿过程中，对供稿部门明确稿件质量、文字表述、图片选取、时间节点等具体标准要求，可通过召开协调会、不同范围专题会等方式，以干代训，提高供稿质量和时效。三是完善内部机制。年鉴编辑部要做好分工协作，精编细校、精益求精，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四是把年鉴编辑出版工作作为馆专项工程，调配优势力量全力支持，齐心协力编好年鉴，确保“一年一鉴、公开出版”。

会后，年鉴编辑部及时召开会议，梳理与会人员提出的修改意见，与供稿单位联系落实有关问题，及时修改样书电子版，积极推进2022卷《天津年鉴》按时出版。

(市地方志馆)